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丛书主编：张静如

丛书副主编：刘会军 刘 敏



徘徊前进

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册主编 ○ 汤中芳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与“左”倾错误的迷局中，中国共产党艰难探索

粉碎“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重申全党要为了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丛书主编：张静如

丛书副主编：刘会军 刘 敏



徘徊前进

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册主编 ◎ 汤中芳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徘徊前进：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汤中芳主编.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10

（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丛书）

ISBN 978-7-202-06982-0

I. ①徘… II. ①汤… III. ①中共十一大（1977）—史料
IV. ①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8160 号

丛 书 名	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丛书
丛 书 主 编	张静如
丛书副主编	刘会军 刘 敏
本 册 书 名	徘徊前进：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 册 主 编	汤中芳
选题 策 划	马千海
责 任 编 辑	甄 洁
美 术 编 辑	李 欣
封 面 设 计	红汇·一品
版 式 设 计	宋晓璐
出 版 发 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4 000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6982-0/D·692
定 价	32.00 元

|| 目 录

CONTENTS

◎ 大会背景 / 001

1975 年全面整顿 / 002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 003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 004

对“两个凡是”的抵制 / 006

◎ 大会纪实 / 009

十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的再次复职 / 010

中共十一大预备会议 / 01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 / 01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华国锋作政治报告 / 013

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 014

代表们分组讨论两个报告 / 015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有关决议和

选举中央委员会，大会闭幕 / 016



重要文献 / 017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 018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 051

中国共产党章程 / 065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 07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

候补委员三百三十三人名单 / 073

历次全会 / 07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 076

中央政治局新成员简介 / 076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 089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 09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 100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 10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 106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 / 108

热点聚焦 / 109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内容特点 / 110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能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原因 / 113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117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 122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 13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	/ 139

④ 重要决议 / 149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 150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	/ 16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163



大会背景

- ④ 1975 年全面整顿
- ④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 ④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 ④ 对“两个凡是”的抵制



1975 年全面整顿 *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7 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邓小平强调：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工作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对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要在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强行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造反派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邓小平还在六十年代初党制定的工业等方面若干条例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文件，提出加快工业、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重要观点。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领导与“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整顿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力图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 年版。

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解决“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问题，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坚决反对派性，大力促进安定团结，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加上江青等人诬告邓小平在搞“翻案”。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主流是好的，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右倾翻案风”。11月初，在“四人帮”的煽动下，毛泽东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看作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并认为他们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于是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一伙趁机对邓小平等进行诬陷和迫害，全盘否定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的政治方针和工作成就，使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4月5日，四五运动爆发，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将其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认定邓小平是这一系列活动的总后台。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之后，以梁效为代表的全国各地的批判组对邓小平一致展开又一波的大规模批判。

8月，中共中央将邓小平主持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

^{*} 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7/4527259.html>

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作为反面材料，称作“三株大毒草”，在全国发动批判运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十里长街、万人同哭的悲壮的送殡场面，反映了人民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对于失去这位领导人的极度痛苦的心情，对于如何才能摆脱灾难争取国家光明前途的无比忧愤的心情。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都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4月4日（丙辰年清明），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当时一再重申的禁令，到天安门广场的达200多万人次。声势浩大，群情激愤，锋芒直指“四人帮”。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并认为它干扰了当时运动的大方向。决定当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等措施。联络员将政治局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4月5日凌晨，群众看到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诗词、挽联等都被撤走，

* 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异常气愤。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晚上9时30分，1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跑步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的群众。4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这次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是在党的正确领导影响下发生的。已经持续近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愈来愈大的憎恶。人们把恢复社会秩序和党的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使人民对“四人帮”产生更加强烈的怒火，终于在天安门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这个抗议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的7月6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9月9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亿万人民对他们在缔造党、军队和国家，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等方面的伟大功绩和卓越贡献，都怀有深深的崇敬和感激之情。他们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9月11日，王洪文撤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党中央同各地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四人帮”还指使他们的亲信在上海加紧装备民兵，作为他们夺权的后盾。“四人帮”还伪造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上反复宣传，以党内“正统”自居。他们在报上公开提出威胁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以此诬蔑和打击华国锋、李先念等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

“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露骨活动使老一辈革命家们深感忧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是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身

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消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痛疽。经过他同叶剑英、李先念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审查。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还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这个决定后来由1977年7月举行的十届三中全会追认。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探知江青等被审查的消息后，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为挽救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最后挣扎。党中央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的局势，使这一叛乱阴谋未能得逞。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对“两个凡是”的抵制*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央政治局立即对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作了周密部署。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要求尽快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同时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当时，纠正冤假错案，首先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要求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二是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

然而，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由于长期形成的严重思想禁锢，这些重大问题一时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

* 徐嘉：《未能纠正“文革”错误的中共“十一大”》，《党史纵览》2011年第8期。

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后被称为“两个凡是”）。由于这一方针当时是以传达党中央声音的权威方式公布的，因而得到普遍宣传。

“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尤其是对邓小平的继续批评和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引起一批老同志的不满。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谈了他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并表示：“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王震也在会上呼吁，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的发言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但由于同“两个凡是”的方针相抵触，结果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

这年2月和4月，邓小平同前来看望他的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党中央转发这封信后，“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很快得到党内许多干部的拥护，成为委婉地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

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进一步鼓舞了许多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促使人们开始比较直接地批判某些主要的“左”倾理论观点。1977年9月前后，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一些老革命家纷纷发表讲话或撰写纪念文章，宣传毛泽东倡导的党的优良传统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陈云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徐向前发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聂荣臻发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等文章，都重点论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必要性，呼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

中央党校在胡耀邦主持工作后，出现了敢于探讨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的风气。胡耀邦明确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1977年7月，他精心指导和创办了一份供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部门参阅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该刊创刊第一期发表的文章，就以《“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为题，对仍被视为不容置疑的“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后，《理论动态》继续就一些重大问题组织文章，为澄清多年来存在的理论混乱，新辟了一个活跃的阵地。

思想理论界的上述努力，不同程度地抵制了“两个凡是”方针。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尽管遇到严重阻碍，但毕竟迈出了前进的步伐。全国人民都期待着召开新一届党的代表大会，彻底实现拨乱反正，引领中国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大会纪实

- ⑤ 十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的再次复职
- ⑥ 中共十一大预备会议
- ⑦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
- ⑧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华国锋作政治报告
- ⑨ 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 ⑩ 代表们分组讨论两个报告
- ⑪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有关决议和
选举中央委员会，大会闭幕

十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的再次复职*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势在必行。为此，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的决定。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首先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开除王、张、江、姚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邓小平再次复出，担任中央党政军领导职务。会议决定全部恢复“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邓小平被撤销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复出后的第一次正式讲话。他首先表达了对为中国革命作出伟大历史贡献的毛泽东的崇敬，对领导粉碎和揭批“四人帮”的党中央的拥护。接着，他坦诚地表示了对于重新出来工作的心情，并再一次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倡导，有鲜明的针对性，有效地抵制了“两个凡是”的影响。

鉴于党的十大以来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十届三中全会批准3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的决定，并为大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全会一致通过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程，讨论并基本通过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决定在1977年下半年的适当时间召开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关于重新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7月22日，全会公报公布的当晚，北京市不少群众自发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23日，首都100多万军民怀着喜悦的心情冒雨举行庆祝游行，同时，十万各界群众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盛大的庆祝会。人们用“英明的决策、伟大的胜利”来称颂全会，用“全党欢呼，全军振奋，人民欣慰！”这样的词句表达对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的拥护。

邓小平的重新复出，顺应了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要求，有力地推动了各个领域亟待开展的拨乱反正的工作。

中共十一大预备会议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日）

1977年8月11日，中共十一大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用了一天的时间，全面检查了十一大的准备情况。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在会议上报告了中共十一大的准备情况，说明了大会主席团及秘书处的设立、代表的组成及大会议程等事宜。

会上，代表们对政治局提出的主席团人员组成名单、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大会秘书长进行了表决，通过了223人的主席团名单；选举华国锋为主席团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选举汪东兴兼大会秘书长。预备会议通过了十一大的议程。1.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2. 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3. 选举中央委员会。

预备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经审查，所有代表资格有效。出席大会的代表为1510名。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

(二百二十三名)

主席 华国锋

副主席 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汪东兴

秘书长 汪东兴(兼)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可则 丁国钰 于桑 于洪亮 万达 万里 马力 马辉 马兴元 马金花(女)
马茉莉(女) 天宝 王平 王昆(女) 王诤 王猛 王谦 王震 王一平 王必成
王光宇 王秀秀(女) 王冶秋 王茂全 王林鹤 王金友 王首道 王恩茂 王超柱
韦国清 尤太忠 毛致用 乌布利 乌兰夫 方毅 邓颖超(女) 孔原 孔石泉 孔宪武
孔照年 巴桑(女) 叶飞 卢忠阳 白如冰 白栋材 冯铨 司马义·艾买提 邢燕子(女)
吕玉兰(女) 吕正操 吕存姐(女) 乔晓光 朱光亚 朱穆之 伍修权 任荣 任仲夷
任思忠 刘伟 刘震 刘子厚 刘光涛 刘兴元 刘伯承 刘建勋 刘春樵 刘锡昌 江华
江礼银 江拥辉 江渭清 池必卿 安平生 关泽海 关晓红(女) 许世友 许家屯
阮泊生 纪登奎 杜义德 杨勇 杨成武 杨易辰 杨得志 杨湘琴(女) 苏静 苏振华
苏毅然 李冰(女) 李强 李子元 李井泉 李水清 李世俊 李任之 李志民 李启德
李昌安 李维康(女) 李葆华 李瑞山 李德生 肖华 肖克 肖劲光 吴德 吴火金
吴全清 吴冷西 吴桂贤(女) 吴梅英(女) 何广乾 余秋里 谷牧 希候巴 汪锋
汪明章 宋平 宋时轮 张才千 张玉华 张平化 张立宪 张廷发 张劲夫 张炳璜
张桂金 张爱萍 张钰秀 张福恒 张鼎丞 张耀词 陈云 陈丕显 陈永林 陈永贵
陈伟达 陈奇涵 陈国栋 陈锡联 陈福汉 陈慕华(女) 陈璞如 林乎加 林李明
林丽韞(女) 罗青长 罗瑞卿 金明汉 周子健 周纯麟 周建人 周培源
宝日勒岱(女) 柯恂(女) 胡耀邦 郝建秀(女) 赵志坚 赵苍璧 赵辛初
赵紫阳 段君毅 饶兴礼 姜凤英(女) 姚依林 秦基伟 耿飚 耿起昌 聂荣臻
贾那布尔 钱之光 钱正英(女) 钱学森 铁瑛 倪志福 徐向前 徐寅生 郭风莲(女)

* 《人民日报》1977年8月21日第3版。

郭玉峰 郭沫若 郭耀卿 唐克 姬鹏飞 黄华 黄镇 黄欧东 黄知真 曹里怀
 曹轶欧（女） 康世恩 康克清（女） 鹿田计 梁必业 韩英 韩先楚 彭冲 彭绍辉
 蒋宝娣（女） 覃应机 粟裕 储江 焦林义 鲁大东 曾绍山 曾思玉 解学恭
 蔡畅（女） 蔡啸 廖汉生 廖志高 廖承志 赛福鼎 谭启龙 谭震林 樊德玲 潘时兴
 霍士廉 戴光前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华国锋作政治报告^{*}

1977年8月12日下午3时半，中共十一大在北京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行各业、各部门的代表共计1510名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党3500多万名共产党员。华国锋宣布大会开幕并主持了这次大会。会议分为四个阶段：12日、13日，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4日至17日，分组讨论两个报告；18日，通过有关决议和选举中央委员会；19日，召开第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成员。

大会开幕后，华国锋首先提议，全体同志起立，为悼念我们党、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悼念去年逝世的我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及近几年间逝世的为我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的董必武、李富春、陈毅、贺龙等，为悼念在这期间逝世的所有对党对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央委员和其他同志们，静默志哀。

随后，华国锋代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报告历时4个小时，约3万多字。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与“四人帮”的斗争过程，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次大会的历史责任，是要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20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他在报告中还宣布，中央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 徐嘉：《未能纠正“文革”错误的中共“十一大”》，《党史纵览》2011年第8期。

会，并同时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

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报告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对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报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最终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叶剑英在党的十一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分八个部分：(1) 关于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2) 关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3) 关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基本任务；(4) 关于“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5) 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6) 关于党的干部路线；(7) 关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8) 关于对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要求。

《报告》指出，我们党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还指出，“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党的重要任务。《报告》要求全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华国锋错误的影响，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这些，对党和国家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个报告在某些方面也沿袭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提法。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提交大会的新党章，虽然对“十大”党章作了不少修改，但未能从根本上否定党的九大和十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在关于党的性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上都沿袭了“九大”党章的错误规定。关于“文化大革命”，在“十一大”党章总纲中，仍认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

* 解放军报网络版 <http://www.chinamil.com.cn/item/new16/txt/qgdbdh/11.html>

代表们分组讨论两个报告^{*}

从8月14日到17日，代表们就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叶剑英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进行分组讨论，代表们畅所欲言，显示了党在粉碎“四人帮”后团结兴旺的景象。在讨论《政治报告》的时候，许多代表结合本单位、本部门实际情况，以大量事实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批判了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愤怒地批判了“四人帮”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行。代表们对党中央打倒“四人帮”的果断决策表示完全拥护，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代表们在发言中认为，“四人帮”长期作恶的原因，一是他们采取了欺骗手段，搞反革命的两面手法，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二是大开帽子工厂，动不动就扣大帽子，对人民进行镇压，大搞恐怖政策。“四人帮”从各方面破坏了党，篡改了党的理论基础，摧残党的干部队伍，毁坏了党的作风，妄图改变党的性质。党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在讨论十一大政治报告时，一些同志对报告中某些“左”倾观点提出批评。有的同志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有的同志说，毛泽东讲过“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而报告对“文化大革命”全盘肯定，高度赞扬，是不合适的；还有的同志针对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的论断指出，“始终”的提法在理论上说不通。聂荣臻在书面发言中针对“两个凡是”的方针指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指南，坚决反对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每一句话当作脱离时间、地点、条件的教条。然而，在政治报告定稿时，这些意见还是没有被接受，从而使“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理论仍然得到延续。

^{*} 徐嘉：《未能纠正“文革”错误的中共“十一大”》，《党史纵览》2011年第8期。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有关决议和 选举中央委员会，大会闭幕*

8月18日下午3时，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这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邓小平。在充分协商和酝酿的基础上，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以及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共有201人，候补中央委员132人。

最后，邓小平在热烈的掌声中致闭幕词，他为拨乱反正作了又一次有力推动。他在闭幕词中号召全党：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邓小平的讲话，抓住了实现拨乱反正任务的关键，对拨乱反正作了一次有力推动。在他的倡导下，一个有利于解放思想、纠正“左”倾错误的氛围开始在党内外逐步形成。

邓小平闭幕词后，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中共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限于历史条件，大会没有能够承担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这一任务。

* 徐嘉：《未能纠正“文革”错误的中共“十一大”》，《党史纵览》2011年第8期。



重要文献

- ⑤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 ⑤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 ⑤ 中国共产党章程
- ⑤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
候补委员三百三十三人名单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报告，八月十八日通过)

华国锋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首先，我提议：

为悼念去年逝世的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悼念去年逝世的我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为悼念十大以来和以前几年间逝世的为我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康生同志、董必武同志、李富春同志、陈毅同志、贺龙同志，为悼念在这期间逝世的所有对党对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央委员和其他同志们，全体起立，静默致哀。

同志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与世长辞将近一年了。在半个多世纪中，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在同党内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尖锐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接着又经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复的激烈的较量，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缔造和培育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锻炼了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缔造和建设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五十多年的中国革命历史表明：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毛主席的旗帜，就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

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主席以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赢得了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

* 《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第1版。

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也是世界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是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共产党人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最新财富，是毛主席贡献给我们时代的最宝贵的遗产。

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为中国人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垂不朽的。

我们一定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是我们团结战斗、继续革命的政治基础，是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胜利保证。我们不但自己要这样做，还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这样做。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作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让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光辉，照耀千秋万代！

同志们！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失去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情况下，是在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提前召开的。今年七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全会通过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四项决议，巩固和发展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成果，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召开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总结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

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次路线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次生死大搏斗，关系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

四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反党集团相勾结，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大以来，“四人帮”反对十大路线，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他们根本反对“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们假借毛主席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另搞一套，妄想扭转运动的方向，煽动乱党乱军乱国。他们使用种种阴谋手法，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我们的毛主席英明伟大，对“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早有觉察，多次对他们提出严肃的批评和严厉的警告，亲自领导我们党对他们进行了反复的斗争。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人帮”背着毛主席，也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三箭齐发，搞突然袭击，破坏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及时地批评“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并为纠正他们的错误向全党批发了文件。“四人帮”抗拒毛主席的批评，不批林，假批孔，猖狂地大搞批“周公”，批所谓“现代大儒”，批所谓“孔老二徒子徒孙”，在我们的军队里大搞什么“放火烧荒”，矛头是针对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针对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江青说：“不

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毛主席批评了“上海帮”，毛主席说：“她（指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一再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就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问题提了出来，当着在京的政治局全体同志的面（除因病不能到会的以外），向“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

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他们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之前加紧结帮篡党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经过紧张的密谋策划，背着政治局派王洪文于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到长沙，向毛主席诬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遭到毛主席的痛斥。他们一计未成，又生一计，由江青出马，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十一月十二日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江青不听告诫，竟然又托人向毛主席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十二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又指出：“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二十四日，毛主席又一次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毛主席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毛主席确定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由周总理负责，提议邓小平同志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随后又委托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就使“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未能得逞。

“四人帮”不甘心于失败。一九七五年三、四月，他们违背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反对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教导，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要给老干部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打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张春桥公然提出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江青到处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姚文元发表文章，公然歪曲毛主席的指示，造谣说毛主席十多年来多次重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姚文元还在一份宣传计划中塞进批判经验主义的内容，妄想骗取毛主席的批准。毛主席看穿了他们的诡计，四月二十三日在这份宣传计划上作了重要批示，批判了“四人帮”的错误。毛主席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



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地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主席针对“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个要害，反复讲了“三要三不要”，尖锐地批评他们“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毛主席明确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强调指出：“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表明了毛主席一定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政治局严肃地批评了“四人帮”。在这前后，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针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贯彻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作了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两次重要谈话。七月二十五日，对电影《创业》问题作了重要批示。《创业》是一部反映大庆工人革命精神的好影片。“四人帮”反对工业学大庆，罗织十大罪名，将《创业》一棍子打死。毛主席在《创业》作者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毛主席的指示，强烈谴责了“四人帮”破坏党的文艺政策。

“四人帮”在受到毛主席多次严厉批评以后，时刻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一九七五年八月，毛主席对《水浒》这部小说作了精辟的评论。“四人帮”以为有机可乘，别有用心地加以歪曲，大肆进行诬蔑毛主席、分裂党中央的恶毒宣传。九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主席批准的议题是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江青却在大寨大讲什么《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影射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并且无理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毛主席知道了以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

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前后，“四人帮”又猖狂活动起来。他们对周总理进行放肆的攻击，并且压制和迫害悼念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和诬陷。“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公开贴出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王洪文私下准备了上台主持中央工作的演说稿。我们的毛主席，十分明确和坚决，就是不让“四人帮”当总理，不让他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主席先后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了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事安排。二月二日，毛主席亲自批发了关于决定国务院代总理的中央文件。四月七日，毛主席又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人事安排。中央设第一副主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是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保证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即使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的情况下，也不致落到“四人帮”手中。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英明决策，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为后来我们解决“四人帮”问题奠定了基础。

对于毛主席确定的上述人事安排，“四人帮”恨得咬牙切齿。张春桥躲在阴暗角落写下的那篇《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就是一个铁证。他们遭到严重失败，就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反扑过来，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加紧了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步伐。他们在报刊上和讲话中，公开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煽动，制造舆论，组织力量，企图把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统统打倒。

毛主席预见到在他身后“四人帮”会闹事。一九七五年初，毛主席在批评江青时就说过：“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一九七六年毛主席病势转重以后，“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果然更加肆无忌惮。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为了不影响毛主席的健康，顾全大局，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毛主席逝世，“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急于发难，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九月十一日，他们背着党中央，私自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重大问题要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切断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他们公开动员和秘密串连，要人向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王洪文私拍了



上台时要用的“标准像”。他们到处活动，制造谣言，刮阴风，烧阴火，煽动反对党中央，并且准备要庆祝他们上台的“盛大节日”。十月初，张春桥在亲笔写的提纲中，提出了要“镇反”，要“杀人”。他们在上海突击下发了大批武器弹药，阴谋发动武装叛乱。更为险恶的是，他们伪造一个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塞在党报社论中发表出去，接着就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而对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却拒不宣传。当党中央在十月二日戳穿了他们的伪造之后，他们竟在十月四日抛出所谓《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说什么“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叫嚷“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就公开发出了推翻党中央的反革命动员令。他们果然要闹事，要政变了。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中央政治局才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实现了毛主席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遗愿。

“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妄想在中国倒转历史车轮，复辟资本主义，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四人帮”是一伙钻进我们党内的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集中反映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关于“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和他们反革命历史的罪证材料，已经发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这些材料，证据确凿，铁案如山，充分证明我们党同“四人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根据党章规定，一致通过决议：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清算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

同志们！“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由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四人帮”就特别地装扮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拥护者，打着这个伟大理论的旗号来篡改这个伟大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大家知道，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那末，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彻底粉碎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全民党”、“全民国家”之类的修正主义谬论。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学说，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

又相矛盾的情况。生产关系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都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此，必须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继续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日益增强的物质基础，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最后达到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毛主席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正确区别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学说。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工人阶级要紧密团结和依靠它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团结和依靠革命知识分子，同时还要争取和团结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和民族资产阶级中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以及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九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经过工作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系列光辉著作，为这种阶级分析奠定了科学的基础。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毛主席又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这种阶级分析。毛主席进一步提出了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提出了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的完整学说。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从理论上系统地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等问题。

“四人帮”全面篡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特别在党内走资派这个问题上，他们肆意歪曲毛主席的思想，制造了许多混乱。他们抛出的那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就是最集中的表现。现在来看看，在党内走资派问题上，毛主席究竟是怎样论述的，“四人帮”是怎样歪曲和篡改的，

又是怎样利用这些歪曲和篡改来推行他们那个反革命政治纲领，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的。

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论述，是以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状况和特点的深刻分析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这样就会产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取得伟大胜利，但是，老的资产阶级还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还经常滋长资本主义势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不断产生。新老资产阶级，就其活动能量和影响来说，在社会上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他们总是要在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党内走资派身上。毛主席指出：社教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是总结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斗争的经验，总结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总结我们党内反对走资派斗争的经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清楚地表明，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这样的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的确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

毛主席在强调同走资派斗争的必要性时，明确指出在我们党的干部中走资派只是一小撮。早在一九六七年毛主席就说过：“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

毛主席还把划分两类矛盾的学说运用于同走资派的斗争，指出：“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这是毛主席关于党内斗争的学说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建国以来党内斗争的实践表明，走资派来自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混在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产产



阶级分子等阶级敌人；另一部分是党内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因而不赞成甚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包括那些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这后一部分人犯走资派错误，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少数是死不悔改的，属于敌我矛盾；多数是愿意并且可以改正错误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对这些同志一定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在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进一步指明了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根本标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毛主席又反复重申了这个根本标准。坚持这个标准，我们就能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准确地识别走资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包括犯了走资派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彻底孤立和集中打击象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正是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上，“四人帮”接过了反对走资派的革命口号，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完整论述，根本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他们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对于我们党政军的各级领导骨干，凡是坚持三项基本原则，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不愿意追随和投靠“四人帮”的，不论是老是中是青，都要统统打倒。对老干部和中年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对青年干部，他们给扣上“投降派”的帽子。“四人帮”的主要锋芒，是针对于担负各级主要领导职务的革命老干部。从批林批孔中搞所谓“批党内大儒”，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搞所谓“反经验主义”，都是要搞老干部。后来他们又提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诬蔑这些老干部在我们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这是对我们党的老干部的恶毒攻击，也是对我们党的性质和党的历史的无耻诽谤。

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的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本不是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只要党和国

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领导核心手中，走资派在党内只是一小撮，并且不断被揭露和清除，不可能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只有象苏联那样，走资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才形成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党也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同走资派作斗争，正是为了防止走资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把我们党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同时也是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警惕犯走资派错误。我们党相继打倒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力地证明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要失败的，我们党不愧是久经考验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

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经历了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我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建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进行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党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抱着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参加革命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入党时虽然带着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教育下，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地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有一批人也还存在对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不足的问题，但是，总的说来，绝大多数都是跟随毛主席继续革命，经过学习和实践的锻炼，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民主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成为走资派，这样的人是有的，但只是极少数。我们党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

“四人帮”胡说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胡说走资派在我们党内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片，不是极少数，而是形成一个“党内资产阶级”。他们还诬蔑军队中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什么“军内走资派”，形成所谓“军内资产阶级”。按照“四人帮”的这种反革命谬论，我国的民主革命岂不是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建立的国家岂不是也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岂不是根本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下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军队岂不是成了资产阶级的军队？我们的党岂不是历来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党，



现在又成了苏修那样的资产阶级的党吗？这真是理论上荒谬透顶，政治上反动至极。这根本不是什么反对走资派，而是根本否定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根本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党我军我国的统治地位，根本否定五十多年来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艰苦奋斗的全部革命历史。这是彻头彻尾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右派谬论。

“四人帮”还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打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旗号，大做反革命文章。正如他们把参加过民主革命而现在又担负领导工作当作划“走资派”的政治标准一样，他们荒谬地把级别高、工资多，当作划“走资派”的经济标准。他们故意把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在分配上存在的差别，同阶级剥削混为一谈，为他们炮制的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谬论提出所谓经济上的论据。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们这一套，不过是他们提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了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四人帮”调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竭力煽动层层揪所谓“民主派”、“走资派”。他们御用的原北京两校大批判组和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宣扬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他们抓的文艺，以写所谓“走资派”为名，肆意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他们抓的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他们抓教育，鼓吹什么“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妄图蒙骗青年充当他们的打手。他们还打着“反对唯生产力论”的幌子，攻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干部是“走资派”，诬蔑广大干部和工农群众坚守岗位、努力生产、大干社会主义是“给走资派脸上贴金”，煽动停工停产，破坏国民经济。他们甚至妄图把专政机关的矛头指向党内，叫嚷要“镇压”和“枪毙”他们所谓的“民主派”、“走资派”。他们还公然鼓吹要取消我们党，用他们的“群众组织”来代替我们党。他们打着“反对走资派”的旗号，搞阴谋，搞分裂，反党反军，妄图搞乱全国。

“四人帮”在“走资派”问题上制造了这么多荒谬理论，借这个题目进行了这么多罪恶活动，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是很清楚的。他们明目张胆地宣扬：“现

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这伙新老反革命，对我们党、对我们军队、对我国革命，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他们喊出了被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打倒的所有反动阶级渴望报仇和复辟的心里话。他们不但要向社会主义革命反攻倒算，而且要向民主革命反攻倒算。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还乡团”。我们党有一套从建党时期到文化大革命的经过考验的老中青干部，我们党有一支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军队，这都是“四人帮”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障碍。“四人帮”要打倒我们党、我们军队的这一套干部，就是妄图摧毁我们党，摧毁我们军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张春桥所说的“改朝换代”，“总把新桃换旧符”，另立他们封资修大杂烩的“新天朝”。这是他们在“走资派”问题上一切谬论的要害所在。

“四人帮”根本否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抛出一套所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荒谬理论。他们所谓的“新变动”，就是老干部变成“走资派”，老工人变成“既得利益者”，青年工人“更不行”，贫下中农搞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跟不上”，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而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象马天水、于会泳、迟群、张铁生、翁森鹤、陈阿大那样一些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则是他们依靠的所谓“先进分子”。这样，他们就全面地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放在同全国人民为敌的地位。

与人民为敌的，必定被人民打倒。上层建筑保护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新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就要起来推翻它。这是一条为全部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客观规律。“四人帮”那一整套理论、路线、政策、思想、舆论和他们那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一种极端腐朽、反动透顶的上层建筑。尽管他们猖獗一时，但是，既然他们这种上层建筑是如此尖锐地同无产阶级专政相对立，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对立，搞得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机器也不高兴，因为使牛、开机器的劳动人民不高兴，那末，人民理所当然地要起来推翻他们，革掉他们的命。他们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同志们！粉碎“四人帮”是我们党的胜利，是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这个伟大胜利，是得来不易的。“四人帮”是同林彪一样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长期隐瞒历史，极其狡猾地施展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钻进党的领导核心，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这个事实，尖锐地说明了反革命两面派的极端危险性。毛主席病重和逝世这种特殊情况，“四人帮”据有的地位和权力这种特殊条件，使这次路线斗争更为复杂和艰巨。但是，不管“四人帮”伪装得多么巧妙，隐藏得多么深，我们党终于把他们揭露出来，把他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使我们国家避免了一次由“四人帮”预谋策划的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革命避免了一次大倒退，使中国这个世界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坚强。这不论对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再一次有力地证明，我们党不愧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党，我们的军队不愧是毛主席亲自创建和教育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不愧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

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毛主席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直接依靠亿万人民群众战胜党内走资派的丰富经验，广大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识别政治是非和政治骗子的能力，他们在反对“四人帮”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觉悟性和识别力，就是最生动的证明。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为普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伟大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

发展，更加深刻地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在世界上，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新鲜经验，大大增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胜利信心。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十大以后，毛主席也一再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但是“四人帮”竭力破坏捣乱。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形势和任务

同志们！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达到天下大治。

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



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做到了这一步，就为实现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本世纪内的历史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志们！十大以来，我们党在对外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我国国际威望不断提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当前国际形势大好，是大好，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几年来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许多国家的革命群众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又有一批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赶走了外国侵略者，获得了独立和解放。一个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干涉、颠覆、控制、欺负的国际统一战线正在广泛开展起来。苏美两霸困难重重，危机四伏，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过去几年中，破坏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战争，使用雇佣军干涉安哥拉和入侵扎伊尔，阴谋颠覆苏丹政府，干涉许多国家内政，挑拨和破坏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它的侵略扩张面目进一步暴露，遭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沉重打击。事实表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国际形势的主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毛主席近几年来反复提醒人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去年初，毛主席指出：“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都想称霸世界，到处争夺，搞得世界很不安宁。他们这样争夺下去，总有一天要打起来。他们到处吹“缓和”，越吹越不缓和。他们拚命喊“裁军”，越“裁”军备越多。他们天天讲“和平”，实际上天天准备战争。全世界人民希望和平，中国人民也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问题不是世界各国人民要打，不是中国人民要打，而是超级大国要打。这是他们帝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毛主席告诉我们，只要帝国主义和

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绝不会有持久的和平。

苏美两家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当前苏美争夺的战略态势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采取攻势，美国帝国主义居于守势。苏修打着“社会主义”、“支持民族解放”、“和平合作”的旗号，加紧推行全球“进攻性战略”，要把整个欧洲、亚洲、非洲拿到手。苏美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但争夺的重点仍然是欧洲。苏联陈重兵于欧洲东部，同时又加紧在非洲和中东掠夺战略资源和抢占战略基地，企图东取波斯湾，南下好望角，西断大西洋交通要道，从侧翼迂回和包围欧洲。西方有一股绥靖主义的思潮，幻想用妥协退让的办法保持和平；还有人甚至想把新沙皇这股祸水推向东方，牺牲别人，保全自己，走张伯伦的老路。这种做法，只能助长苏修的扩张野心，加速战争的爆发，到头来，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世界大战，有两条，“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苏修、美帝都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野心很大，但它本质虚弱。它到处侵略扩张，把自己放在同各国人民为敌的地位，正起着很好的反面教员的作用。只要各国人民提高警惕，紧密团结，做好准备，进行不懈的斗争，有可能推迟战争爆发的时间，而且一旦打起来，也将处于有利的地位。我们是革命乐观主义者，对世界前途充满信心。

毛主席一九七四年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毛主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改组，以及各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对当代世界的战略态势作出科学的概括。苏美两霸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受压迫最深，反抗最烈，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第二世界国家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有压迫、剥削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面，又有在不同程度上受两霸控制、威胁和欺负的一面。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明了当前国际斗争的大方向，明确了谁是主要的革命力量，谁是主要敌人，谁是可以争取、联合的中间力量，这就使国际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中，能够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反

对主要的敌人。这样的战略规定，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当代斗争的战略要求的，符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当代斗争的战略要求的，也是符合争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战略要求的。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在当代的正确的战略规定和策略规定，是无产阶级在国际斗争中的阶级路线。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的这一理论是完全正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将显示出更加强大的威力。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同时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列宁说过：“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当今各国人民反霸斗争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大现实意义。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我们支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但是不支持修正主义。我们是共产党，当然要支持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同时，我们也从来认为，各国的共产党是独立的，自主的。各国的革命要靠本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人民来完成。革命不能输出。我们从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我们党同很多共产党有关系。这种党和党之间的关系，同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两回事。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们坚定地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

我们支持欧洲、日本等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斗争，支持他们在斗争中联合起来。

中国和美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存在根本的分歧。一九七二年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是当前两国关系的基础。上海公报指出，双方都不应谋求霸权，也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只要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

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根据公报的精神，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断绝同蒋帮的所谓外交关系，撤退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同蒋帮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台湾省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

苏联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到处侵略扩张，使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同它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坚持同它的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我们一贯主张，中苏两国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集团对改善中苏国家关系根本没有诚意，不但使拖延八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毫无结果，而且为了摆脱内外困境，转移视线，声东击西，不断掀起反华浪潮。他们用种种手段妄图迫使我们改变毛主席制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完全是痴心妄想。使中苏国家关系“走进死胡同”的，不是别人，正是苏联领导集团。如果苏联领导真要改善中苏国家关系，就应当拿出实际行动来。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要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要在对外工作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我们要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联合一切受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我们要加强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把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同志们！当前国内形势大好。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就是形势大好的根本标志。

在反对“四人帮”这样一场尖锐、激烈的伟大斗争中，群众动员这样广泛而又这样有秩序，运动发展这样迅猛而又这样健康，充分说明了党心所向，军心所向，民心所向。十个月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集中揭批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他们的罪恶历史，揭批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清查了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打击了他们支持、纵容和包庇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十个月的激烈斗争，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我国阶级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资产阶级的深刻变化。

革命促进了生产。打倒“四人帮”以后，经过短短几个月时间的努力，我们就扭转了由于“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造成的生产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降的局面。今年三月以来，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商品购销、财政收入全面上升，并且相继超过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创造了新的纪录。一些长期被“四人帮”严密控制和插手破坏的地区，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六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月水平。农业生产尽管遭到了罕见的严重干旱和其他自然灾害，但是由于广大社员的努力，大大减少了损失，许多地区夏粮仍然取得比较好的收成。广大干部和群众决心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斗争中大显身手，大干一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蓬勃发展。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不但在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而且在部门之间，在省、市、自治区之间，开展起来。一个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

在各个文化领域，广大群众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在深入，逐步克服“四人帮”所造成的严重破坏，推动科技战线的革命和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向前发展。

总之，形势大好，人心思治。十个月来国内形势的一切变化和发展完全证明，揭批“四人帮”的伟大阶级斗争是当前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根本动力，党中央作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非常及时的。

在今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代表党中央提出达到天下大治的八项要求，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赞同。中央认为，这八条，就是我们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主要的战斗任务。

首先，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和反革命罪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

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楚。少数地区和部门领导仍然落后于群众的情况，必须迅速改变。同时，运动越深入越要注意党的政策。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斗争已经形成高潮的地方，各级领导更要十分清醒，时刻牢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我们所说的“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指“四人帮”和那些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在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当中，属于“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的，只是极少数。在清查工作中，一定要十分注意：把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把参与某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但是尚属受人利用，犯政治错误的人，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在骨干分子当中，又要把那些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打招呼会议之后愿意悔改，揭发“四人帮”罪行，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的人，同继续顽抗的死硬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对于一切可以争取的犯了错误的人，要认真做好思想转化工作，不要把他们推开。只有这样，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集中打击“四人帮”及其一小撮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死党。还要注意，狠狠打击那些仇恨社会主义，在“四人帮”及其余党支持和纵容下实行阶级报复，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查工作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抓紧进行，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要根据情况，争取今年内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

深入地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肃清其

流毒，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对于“四人帮”在思想理论和路线上造成的混乱及其对我们队伍的腐蚀，不可低估。要充分利用“四人帮”这个反面教员，进行广泛深入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密切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把被“四人帮”颠倒了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一一纠正过来。毛主席教导我们：“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我们一定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依靠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上，总结经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

第二，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

抓纲治国，首先要治党。根据毛主席的建党学说，根据毛主席关于“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认真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这是把我们党整顿好、建设好的中心任务。

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经得起任何严峻考验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应当看到，“四人帮”那一套，对党的肌体和党员的思想腐蚀很大，对党的团结、纪律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危害很深，对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传统破坏严重。在整党整风中，要彻底批判“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破坏党、瓦解党、实行篡党的严重罪行，批判他们煽起的那股资产阶级邪风。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整党整风就有了正确的方向。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党的建设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普遍地、深入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武装全党的问题。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指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下大决心，花大气力，进一步改造全党的学习，力争几年内使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大大前进一步。

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的体系。当前特别要学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要继续学好其他各卷。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提倡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要切实办好中央党校和各级党校。要通过多种形式发挥工农兵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队伍的战斗作用，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全党同志，各级干部，都要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学业务、学技术，做到又红又专。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奋发努力，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的专家。

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增强党的观念，增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是搞好党的整顿和建设的重大问题。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而造成的那种否认无产阶级党性和党的纪律，闹资产阶级派性，搞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错误倾向，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和纠正。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决不容许任何派别活动。党要管党的工作。党要管干部工作。入党要按党章规定，提干要按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要搞五湖四海。要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的队伍，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使我们党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钢铁般地巩固起来。

要真正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必须整顿党的作风，在全党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优良传统的再教育。在毛主席的培育下，我们党形成了一整套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毛主席历来倡导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历来倡导实事求是，科学态度，老老实实在地办事。“四人帮”确实把我们党的风气搞坏了。在我们党内，滋长了脱离群众、弄虚作假、看风使舵、投机取巧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的作风，这是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和纠正的。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把毛主席亲自倡导和培育的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那末，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一定能够更加紧密，我们党的战斗力就一定能够更加增强。

要加强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把这些组织整顿好、建

设好，充分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我们这次大会之后，结合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整党整风运动就要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经过整党整风，我们的各级党组织，一定能够进一步发挥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作用。

第三，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

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经过整顿，把各级领导班子逐步建设成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和指示，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团结战斗，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精干的领导班子。

“四人帮”招降纳叛，结帮营私，使一些领导班子严重不纯。对这些领导班子，从组织上加以整顿和清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就绝大多数领导班子来说，则主要是思想整顿的问题。要在党内展开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借以达到提高政治觉悟，提高领导艺术的目的。重在教育。在思想斗争中，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

搞好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老干部应当以极大的热忱帮助青年、中年干部，支持他们的工作。没有广大的青年、中年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党的事业就会中断。无论新干部、老干部，犯点错误都是难免的。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干部的一贯方针。这一条，无论对新干部、老干部，都是适用的。老干部也要自觉地整一整风，给青年干部做个榜样，搞好传帮带，把毛主席建立的党的学说、党的作风真正传下去。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我们各级领导班子，首先是高级干部，

一定要认真记取。

第四，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下迅速发展生产力，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战胜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是加强国防力量，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是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从长远来说，也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条件的需要。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领域之所以还要继续革命，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反过来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国经济形势的发展，深刻说明，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抓住学大庆、学大寨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能够发生多么巨大的威力。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同学大庆、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更深入地开展起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备战、备荒、为人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要奋战几年，按照原定规划，按照大庆式企业和大寨县的标准，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做到这一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就将大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也将大为繁荣。

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粉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几年来，在“四人帮”支持和包庇之下，一些地方和单位资本主义泛滥，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外勾结，城乡串通，猖狂进攻，使一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极少数单位蜕化变质。应当在适当时机大张旗鼓地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打击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各种资本主义的非法活动，坚决制止破坏国家计划的行为。要打击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也要解决人民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问题。保卫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斗争，还要长期地继续下去。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任务。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



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实现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跃进。打倒“四人帮”，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真正把干劲鼓足，并且精心地加以组织。要精兵简政，减少非生产人员，加强生产第一线。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要把冲天干劲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力争上游，上游在哪里？大庆、大寨就是上游。争上游就是要象大庆、大寨那样干革命、干建设，干得多快好省！到一九八〇年，要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要基本实现机械化，农林牧副渔五业都要有较大增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工业要搞好轻工业，同时大力加快基础工业的发展，集中力量打几个高速度发展基础工业的歼灭战，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更大发展创造条件。

科学研究工作，应当走到经济建设的前面，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现在却落在后面。这个问题关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必须认真抓起来。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次大会，要交流经验，制定规划，表扬先进，特别要表扬有发明创造的科技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把科技战线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向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军。

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针，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各省、市、自治区，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社的积极性。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教育上大力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在经济政策上则要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且逐步扩大集体福利。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我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以前是好多了，但水平还低。我们各级领导任何时候都要关心群众疾苦，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我们的人民是很讲道理的，他们懂得，只有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尽快地发展生产，才能使大家的生活不断地有所改善。

第五，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

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七月的两次重要谈话中尖锐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

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毛主席还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毛主席的指示，是对“四人帮”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严厉谴责，同时又是对广大文化学术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战斗在社会主义文化战线的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应当动员起来，立大志，鼓干劲，遵照毛主席的遗愿，认真搞好各个文化领域的革命，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努力创作具有革命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丰富多采的文学艺术作品，大力开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

社会主义文化要繁荣发展，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推陈出新的方针。针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毛主席近几年来反复强调并亲自倡导在各个文化领域贯彻这些方针。还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就对出版学术刊物和整理古代文化遗产问题，作了多次重要指示。特别是在一九七五年，毛主席不但对电影《创业》问题和《水浒传》研究作了著名的光辉指示，而且亲自过问小说、戏剧、电影的创作，亲自批准关于研究和出版鲁迅著作的建议，批准出版《诗刊》、《人民文学》等文艺、学术刊物，批准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和冼星海，肯定和支持湘剧影片《园丁之歌》，等等。毛主席这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指示，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进一步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教育战线，也是我们党同“四人帮”激烈争夺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线。要在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材。这就要从教育入手，要真正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四人帮”根本违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鼓吹什么“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愚民政策。我们一定要通过揭批“四人帮”，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和加快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提高教育质量，以配合各项经济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应当看到，建

立一个充分体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适合我国情况，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战斗在教育战线上的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创立这样一个崭新的教育制度而努力。

建国以来，尽管我国文教、科技战线的工作，受到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广大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卫生工作者辛勤劳动，为人民出了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大部分是新社会培养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愿意和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这是一支很可宝贵的力量。虽然总的说来，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还是少数，但是大多数人，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在逐步形成和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反对社会主义的，只是极少数。“四人帮”根本抹杀建国以来我们党培养和改造知识分子的巨大成绩，打击和扼杀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他们一面收罗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为他们服务，一面却把广大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诬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针对“四人帮”这一套，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老九不能走”。毛主席又指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毛主席还指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毛主席还以受到恩格斯批判的杜林为例，尖锐指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只要他们爱国，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让他们好好工作。同时，我们又必须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热情帮助和鼓励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努力改造世界观，坚持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逐步无产阶级化，做到又红又专。教育和改造，是从爱护出发，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正是毛主席为我们党制订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着重点。建设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是我们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都应作出规划，抓紧落实，为实现这个任务而努力。

第六，一定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

人民解放军当前的任务，就是抓纲治军，把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引向深入，促进战备工作和部队建设，进一步加强革命化和现代化。

“四人帮”根本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建军原则，妄图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破坏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统一的武装力量体制，阻挠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干了许多坏事。他们的反军乱军篡军的阴谋活动，受到了全军广大指战员的抵制。抓纲治军，必须以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为指针，紧密联系部队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进一步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最近，全军抓住被“四人帮”颠倒了路线是非的十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大力发扬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和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广泛开展学习雷锋和“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推动了战备训练，出现了朝气蓬勃的革命气象。我们要继续努力，把我军革命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我们面临着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一定要准备打仗。要遵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的指示。要坚持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不论敌人早打晚打，小打大打，打常规战争或打核战争，我军都要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战争这个法宝，随时准备粉碎一切敢于入侵之敌。“四人帮”把国防现代化诬蔑为“单纯军事观点”、“唯武器论”，破坏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妄图使我军在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面前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我们要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战备的罪行，从各方面切实地加强战备。特别要

遵照毛主席关于“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的教导，大力加强军事训练，苦练过硬的杀敌本领。要努力办好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大力培养各级军政领导骨干和技术人材。同时还要大力加强国防科学研究和国防工业生产，把我军装备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民兵工作很重要。要按照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加强民兵建设，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贡献。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

要加强公安工作和社会主义法制。要彻底清除“四人帮”颠倒敌我的种种谬论的流毒，分清敌我，把专政矛头对准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以及一切卖国贼。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打砸抢者和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要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保护人民利益，保卫社会主义制度。

第七，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

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让人家讲话，让人家批评，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毛主席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一封批评江青的群众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在这之后不久，毛主席又针对“四人帮”的专横跋扈，尖锐地指出：“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象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一方面恣意践踏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乱打棍子，乱扣帽子，凌驾于党之上，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另一方面，他们又煽动无政府主义，鼓吹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砸烂一切规章制度”，“越乱越好”。他们既破坏无产阶级的民主，又破坏无产阶级的集中。在深入揭批“四人帮”中，一定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

为了健全民主集中制，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教育我们的同志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一方面，要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

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一方面，要防止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扬民主，是为了更好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而决不是要削弱以至破坏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削弱以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为了健全民主集中制，还必须坚决反对一切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健全民主集中制，实现毛主席所倡导的这种政治局面。

第八，一定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

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这是我党历来的方针。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

要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就必须消除“四人帮”干扰破坏在各方面所造成的恶果，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毛主席为我们党制订的无产阶级政策。无论干部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作出适当的安排。毛主席的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我们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掌握，更好地付诸实践。

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也要妥善安排。少数人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同时，我们的同志，尤其是受过审查的同志，一定要注意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知识青年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又有文化，我们应当把他们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对于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则应当按照统筹解决的方针，切实解决好。

做好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工作，十分重要。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要认真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切实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要经常地广泛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的教育，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团结。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我们要坚持这个方针，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

以上所说的我们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八项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要进行大量的艰苦工作，使各项任务得到全面的贯彻和落实。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它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的大好形势，巩固和发展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成果，推动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地完成抓纲治国的各项战斗任务。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还将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我们必须作出认真的努力，调动起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加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同志们！

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展望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我们对夺取更大的胜利，信心百倍。我们这个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这个国家是大有希望的。正如毛主席所说：“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我们党取得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过程，就是全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越

来越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并且据以制定和实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过程。可以预期，经过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经过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和全党整风运动，我们党必将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思想上更加一致，在组织上更加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大踏步地胜利前进。

当然，道路总是不平坦的，革命总是波浪式前进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按辩证法办事。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不屈不挠，胜利的时候要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戒骄戒躁。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团结战斗，我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人世遭逢的任何困难，创造人间奇迹。全世界会看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征途上，不但善于战胜国内外阶级敌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将善于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报告，八月十八日通过）

叶剑英

同志们：

现在，我受党中央委托，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在我们党取得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的情况下，由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主持召开的。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大会。华主席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高举马克思

* 《人民日报》1977年8月24日第1版。



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精辟阐述了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全面总结了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基本经验，深刻分析了国内国际的形势，明确提出了我们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战斗任务。华主席的政治报告，必将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九七六年一月，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任国务院代总理。同年四月，毛主席又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把党和国家的领导重任交给了华国锋同志。党中央设立第一副主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是毛主席针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活动，作出的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毛主席亲笔给华国锋同志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华国锋同志一贯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华国锋同志既有长期的地方领导工作经验，又有中央领导工作经验，他联系群众，处事持重，英明果断，善破善立，具有全面地领导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工作的才能。在“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达到顶点的时候，在我们党和我国革命处于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华国锋同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采取非常果断的措施，率领全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使我们党和国家避免了一次大倒退、大分裂。就在这个非常时期，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一致作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这个决议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得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致拥护和赞同。华主席领导我们党取得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不论在我国和在全世界，都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展开反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克服“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困难，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新的高潮。实践证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

不愧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不愧为我们军队的英明统帅。华主席一定能够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胜利地跨进二十一世纪。今后，如果国内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我们就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运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动员全体人民，实行大民主，革走资派的命。如果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武装侵略，我们就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统率下，运用人民战争的办法，动员全国人民，打败侵略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定能够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战胜一切国内外敌人，克服一切困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同志们，我们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是修改党的章程。在毛主席领导下，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四人帮”全面反对十大路线，破坏党的建设，妄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我们党。他们的这种反动企图遭到了彻底失败。党中央认为，我们应该根据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吸取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新经验，对十大党章进行必要的修改。现在提交大会讨论的党章修改草案，是十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的。修改过程中，在中央各部门，在地方和军队，广泛征求了党内从领导到基层各方面的意见。这里，我对党章修改草案，做以下几点说明：

第一，关于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党章修改草案在“总纲”中记载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写上了“毛主席的旗帜，是我们党团结战斗、争取胜利的伟大旗帜”，这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缔造者。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毛主席又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的复杂的斗争，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把我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总结了我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



大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场政治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和王张江姚“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空前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场政治大革命，粉碎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使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悲剧没有能够在我国重演，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新的经验，给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的斗争中，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为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

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在我国人民革命史册上，在世界人民革命史册上，是永垂不朽的。毛主席的旗帜是革命的旗帜，胜利的旗帜。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旗帜，不仅关系到我国革命事业的成败，而且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命运。党章修改草案明确规定：“全党一定要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党的事业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胜利前进。”

第二，关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

毛主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毛主席对于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组织原则，党的作风等方面，都有完整的论述。正是因为毛主席有这样一套完整的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培育我们党，我们党才建设成为这样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根据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党章修改草案对十大党章关于党的性质的一段，作了修改和补充。“总纲”明确写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

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四人帮”为了达到以帮篡党，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竭力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他们到处收罗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流氓分子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把这些专门和无产阶级捣乱的反动家伙封为“先进分子”，拉入党内，让他们到处去篡夺领导权。“四人帮”一伙叫嚣要“用群众组织代替党”，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就是要用他们那个帮来取代我们党。如果“四人帮”的阴谋全部得逞，那末，我们的党必然整个地改变颜色，变成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党，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大分裂，大混乱，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

我们党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四人帮”妄图从根本思想上扰乱我们党。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大搞修正主义，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针对这种情形，在“总纲”指导思想一段中，增写了“党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四人帮”对我们是很好的反面教员，他们在党的性质和领导作用问题上制造的混乱，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他们从反面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还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另一个教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一定要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的先锋队的作用。同时，要把各级革命委员会，把工会、共青团、贫协、妇联等革命群众组织整顿好、建设好，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

第三，关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党的基本任务

党章修改草案对十大党章关于党的基本纲领一段作了修改，规定：“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

是实现共产主义。”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早已推翻了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在我国社会中，已经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还存在，而且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对小资产阶级的改造也还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为了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彻底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必须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章修改草案关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就是根据这一精神规定的。

一九六三年，毛主席曾经指出：“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一九六六年，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就是在帝国主义统统打倒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哪一年建成共产主义也还是说不定的。因为资产阶级虽然打倒了，并没有死。他们用各种方法腐蚀共产党。”这就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统统被打倒以后，在一个时期里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始终存在的，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在这个历史阶段结束之前就将被打倒。根据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党章修改草案对十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段落做了相应的修改。

党章修改草案对十大党章中关于国内任务的一段作了一些修改，增写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等重要内容。

第四，关于“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

在党章修改草案“总纲”中，对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给与了比在十大党章中更加突出的位置。

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是毛主席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发展。这三项基本原则，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五十年来历次大的路线斗争的经验，高度概括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内容，深刻揭露了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的主要政治特征。毛主席多次用这三项基本原则警告“四人帮”，揭露了他们的本质，打中了他们的要害。“四人帮”拒绝改悔，顽固地坚持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我们夺取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胜利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是识别和战胜党内走资派的锐利武器。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都要坚持这三项基本原则，牢牢掌握这个武器。

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四人帮”篡改这个革命原则，抹杀它的阶级内容，蓄意制造混乱。他们为了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利用反潮流这个口号，煽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流。我们的许多党员，许多革命干部，在“四人帮”煽起的反动潮流面前，出以公心，坚持党的原则，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无所畏惧，表现了毛主席所提倡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值得大家很好地学习和发扬。

毛主席讲的反潮流，就是反对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恶流。根据这个精神，党章修改草案对十大党章关于反潮流问题的表述作了修改，明确写上：“对于违反三项基本原则的潮流，要有敢于反对的革命精神。”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形下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顶住和击退修正主义所掀起的狂风恶浪。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要求我们不断增强党的团结，战胜任何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的倾向。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要求我们彻底揭露和战胜任何搞阴谋诡计的人。光明正大，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而要阴谋，施诡计，就一定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破坏党的团结，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全党同志一定要运用“三要三不要”这个锐利武器，区别正确潮流与错误潮流，发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斗争。

第五，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党章修改草案“总纲”中增写了这方面的内容，并在其他有关条款中增添了一些必要的规定。

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四人帮”蓄意践踏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大搞反党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他们既破坏民主，也破坏集中。他们专横跋扈，称王



称霸，对有不同意见的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严重地摧残党内民主。他们把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攻击为应该抛弃的“老一套”的“条条框框”，鼓吹无政府主义，叫嚷“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严重破坏党的集中领导，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我们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妄图分裂党、搞垮党的反革命罪行，同时，要在全党认真进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

毛主席强调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怎样才能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呢？这就要求我们，在党内，在人民内部，真正实行毛主席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不许群众讲话，怕群众提出不同的意见，压制群众的批评，是完全错误的。这就要求我们，用民主的方法，也就是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处理同志之间的关系，而不能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这就要求我们，在党委内部，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依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防止和克服个人说了算或者个人不敢负责的不良倾向。只要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发扬民主的重要性。任何破坏党的民主生活，侵害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为，都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的，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党章修改草案明确规定，党员有权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提出申诉；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讨论，有权越级直

至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报告。决不允许任何人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的人，应当受到查究和处分。这些规定，正是为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

当然，如果没有集中的指导，民主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走到邪路上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破坏集中也就破坏了民主。在“四人帮”影响下，我们党内确有一些人闹资产阶级派性，爱好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希望最好不受党组织和上级的约束。他们不懂得共产党内绝不允许有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共产党员绝不能参加而且必须反对任何分裂党的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不懂得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不懂得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不懂得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毛主席说：“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我们党要领导各族人民，在一个有着八亿人口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铁的纪律行吗？列宁说：“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为了保证我们党的行动统一，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党章修改草案在“党的组织制度”一章中突出了“全党必须服从民主集中制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共产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和上级的决定，绝不能采取自由主义态度，满意的就执行，不满意的就不执行，绝不能阳奉阴违，打着拥护的旗号，另搞一套。毛主席早就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我们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多次提倡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复强调“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我们每个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

为了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纪律，防止和纠正各种危害党与群众关系



的现象，党章修改草案还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它的任务是：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受理党员的申诉和控告，并受理党外群众对党员的控告。

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只要我们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就一定能够造成毛主席讲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不仅在全党，而且在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中都能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

第六，关于党的干部路线

党章修改草案在“总纲”中增写了关于干部路线的问题。干部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党的干部路线是什么呢？毛主席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干部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四人帮”在招降纳叛，结帮营私这点上，大大超过了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他们仇视一切经过革命斗争考验，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年干部和中年干部，也仇视一切坚持原则，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青年干部。他们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对他们的党羽，大加提拔重用，并采取打、压、拉和封官许愿的卑劣手段，收买干部，培植亲信。我们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反复证明，“任人唯亲”的资产阶级干部路线是涣散党、瓦解党的毒剂，实行无产阶级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才能使党团结兴旺。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

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党章修改草案规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条件，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一定要把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符合接班人五项条件的优秀分子提拔起来，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组成各级领导班子。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老干部要热情帮助和支持新干部，要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作为自己的重大责任。

毛主席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要善于使用干部。要有自知之明，也要有知人之明。任何同志都有长处，也有短处。对自己要一分为二，对别人也要一分为二，都要按辩证法办事。所谓“贤者”，就是要顾大局，识大体，抓大事。当然，“贤者”也不会没有一点短处，也要一分为二。领导者要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同时又要帮助别人克服他的短处，这就叫做知人善任。

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什么态度，是干部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家知道，毛主席历来反对把犯了错误的同志“一棍子打死”。毛主席说：“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毛主席历来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不论对老年、中年、青年同志，都应当这样做。“四人帮”对于不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人，借口或者捏造他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要统统加以排斥，加以打倒。“四人帮”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要搞垮我们的干部队伍，搞垮我们的党。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一切革命同志，包括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一道工作。

第七，关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

在党章修改草案“总纲”中增写了一段：“全党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利用职权谋取任何特权，同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作坚决的斗争。”在“党员”、“党的基层组织”等章中，也作了相应的补充。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早已深深扎根于广大党员和干部中。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近几年来，“四人帮”严重地破坏我们党的传统和作风，特别是破坏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受他们的影响，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不同程度地滋长了不正之风，这种情形应当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

关于党的作风问题，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全国胜利前夕，毛主席及时指出，在胜利的条件下，必须特别注意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国解放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一点。这是因为我们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这种地位很容易使许多同志忘乎所以；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用他们的思想和作风来侵蚀我们党。毛主席曾经针对我们有些干部脱离群众，不愿与群众同甘共苦，争名夺利，唯利是图的危险倾向，严肃地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主席又曾经针对党内一些干部脱离实际，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况，指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

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通过批判“四人帮”和整党整风，来一个思想革命化，使我们的作风有一个大的改进。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我们要最密切地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相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有事同群众商量，真正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加强调查研究，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谦虚谨慎，力戒任何的虚夸与骄傲。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同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作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八，关于对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要求

关于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和党的基层组织的任务，党章修改草案在十大党章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改。

我们党是一个执政的党，在我们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共产党员，尤其是担任党政军各级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所负的责任是重大的。因此，党必须对党员，特别是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我们党三千五百万党员中，文化大革命以来入党的占近半数，党的十大以来入党的有七百万，新党员占的比重相当大。无论是新党员或老党员，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必须看到，由于近几年来“四人帮”篡改党的路线，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另立党员标准，制造了许多混乱，党员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不纯的情况是严重的。毛主席曾经说过：“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这样的共产党员，现在确有不少。除那些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必须清除以外，对那些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必须加强教育。就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也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继续提高自己的任务。一般说来，许多新党员对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基本知识和党规党法还缺乏了解，对他们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有关对党员要求的条款，就是根据这些情况修改的。

党章修改草案对党员提出了八项要求。这是根据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项条件的精神和毛主席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一贯教导写的。为了便于教育党员贯彻执行，便于党组织督促和检查，对党员的要求规定得具体一些，显然是有好处的。

党章修改草案作了党员预备期的规定。预备党员一律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才能转为正式党员。作这个规定，是为了对党员更好地进行教育，更好地进行考察了解，保证党员的政治质量。近几年来，“四人帮”另立党员标准，搞“突击入党”，使一些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混入党内。针对这种情况，作这一规定也是必要的。

党的基层组织处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又处在同党外广大群众最接近的地位。对党员经常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靠党的基层组织做工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各

项任务，也要靠基层组织来落实。“四人帮”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反对在党内外群众中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反对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把这污蔑为“矛头向下”，是“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不少基层党组织，顶住妖风，排除干扰，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党章修改草案吸收大庆、大寨和“硬骨头六连”等先进单位党组织的经验，对基层组织的任务规定得更加具体明确，便于贯彻执行。我们一定要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使基层组织成为我们党领导党内外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向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战斗堡垒。

总之，党章修改草案中对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要求，都是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质量，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增强党的战斗力。

同志们！党章修改草案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建党学说，贯穿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路线，反映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的胜利成果。经过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将是加强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武器。我们一定要按照新党章的规定，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使我们党充分发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党的各级组织，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坚决执行党章，并且同任何违反党章的言论和行动作斗争。

我们党，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刻。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标志着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还要长期继续进行下去。象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以后也还要进行多次。我们面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极其艰巨而伟大的。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为完成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抓纲治国的八项战斗任务，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通过)

总纲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的斗争中，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经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的复杂的斗争，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旗帜，是我们党团结战斗、争取胜利的伟大旗帜。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

* 《人民日报》1977年8月24日第1版。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中国共产党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要坚持无产阶级民族政策，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全党同志必须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对于违反三项基本原则的潮流，要有敢于反对的革命精神。

全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军阀主义。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加强党的团结，反对分裂党的行为和派别活动，反对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在党内同志的关系上，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要采取辩证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达到新的团结。要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党要认真执行无产阶级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反对资产阶级的“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条件，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纯洁性。

全党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任何特权，同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作坚决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以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党的纲领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全党一定要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党的事业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胜利前进。

第一章 党员

第一条：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章程，自愿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交纳党费，方可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条：中国共产党要求党员做到：

-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
-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
- （三）团结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
- （四）密切联系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
- （五）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敢于同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和行动作斗争；
- （六）维护党的统一，不参加并且反对任何分裂党的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
- （七）对党忠诚老实，遵守党纪国法，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
- （八）积极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

革命运动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第三条：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要有正式党员二人负责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委批准，才能成为预备党员。

上级党委对于申请入党的人，在批准他入党以前，要指派专人同他谈话，并进行认真的审查。

第四条：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一年。党的组织对预备党员应加强教育和考察。

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党的支部应及时讨论他能否转为正式党员。具备党员条件的，应按期转为正式党员；需要继续考察的，可延长他的预备期，但不能超过一年；确实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或延长预备期、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均需经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委批准。

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从上级党委批准他入党之日算起。党员的党龄，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

预备党员没有正式党员享有的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五条：党员违反党的纪律，党的组织要进行教育，并且可以按照具体情况，分别给以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党员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两年。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经过留党察看，改正了错误的，应当恢复他的这些权利；坚持错误不改的，应当开除他的党籍。

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应当开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

第六条：对党员的纪律处分，必须经过支部大会决定，报上级党委批准。在特殊情况下，党的基层委员会和它以上的各级党的委员会有权给党员以纪律处分。

对地方各级党委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或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同级党的委员会决定，报上级党委批准。

对军队各级党委委员的纪律处分，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据党章作出相应的规定。

对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的纪律处分，必须由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

党的组织对党员作出处分决定时，除特殊情况外，应当通知受处分的本人到

会。受处分的党员，对处分决定有不同意见，可以要求复议，并有权向上级党委直至中央委员会申诉。

第七条：党员革命意志衰退，不起党员作用，经多次教育仍无转变，可劝其退党。劝退党员必须经支部大会决定，并报上级党委批准。

党员没有正当理由，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并且不交纳党费的，就被认为自行脱党。

党员要求退党或自行脱党，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上级党委备案。

第二章 党的组织制度

第八条：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

全党必须服从民主集中制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第九条：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各级委员会都应当按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经过民主协商，由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

第十条：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和军队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是同级的党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和它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各级党的代表大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召开。地方和军队各级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党委会的人选，都必须经上级党委批准。

第十一条：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要依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一切重要问题都由集体决定，同时使个人发挥应有的作用。

党的各级委员会，根据密切联系群众和精简的原则，设立办事机构。县和县以上各级党委必要时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机关。

第十二条：党的各级委员会要定期向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报告工作，经常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接受监督。

党员有权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提出申诉。决不允许任何人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的人，应当受到查究和处分。

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在党的

会议上提出讨论，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报告，但在行动上必须坚决执行。

第十三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

第十四条：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及民兵，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贫下中农协会、妇女联合会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

在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应设立党组。中央一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党组成员由党中央指定。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党组成员由相当的党委指定。

第三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十五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十六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第四章 党的地方和军队中的组织

第十七条：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的各级党的代表大会，每三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经上级党委批准，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产生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

第五章 党的基层组织

第十八条：厂矿企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商店、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根据革命斗争需要和党员多少，经上级党委批准，设立党的

支部、总支部、基层委员会。

党的支部委员会每年选举一次，党的总支部委员会、基层委员会每两年选举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经上级党委批准，可以提前或延期选举。

第十九条：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它的基本任务是：

（一）领导党员和非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路线的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

（二）领导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三）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和决议，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并向上级如实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关心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生活；

（五）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违法乱纪、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以及其他一切不良倾向作斗争；

（六）发展新党员，执行党的纪律，整顿党的组织，吐故纳新，纯洁党的队伍，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

邓小平

同志们：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在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主持下，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大会主席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一致通过了华主席的政治报告，一致通过了新党章和叶副主席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庄严任务。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的大会。这次大会，真正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

^{*} 《人民日报》1977年8月25日第1版。

发扬了民主，大家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真正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这次大会，将作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而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我们有这样好的人民，这样好的党员和干部，他们勤劳勇敢，觉悟很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无限信任我们党。这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最可靠的保障。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一定要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的虚夸，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内和整个人民内部，认真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党全国面目一新，我们已经取得重大的胜利。但是，阶级斗争是长期的，革命事业是无止境的。我们一定要把反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行艰苦的努力，把被“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严重损失和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我们要正视现实，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还有不少困难有待我们去克服。我们深信，只要我们真正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够战胜一个一个困难，取得一个一个新胜利。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

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努力奋斗。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现在我宣布：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 候补委员三百三十三人名单^{*}

中央委员二百零一人

华国锋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可则 丁国钰 于桑 于明涛 于洪亮 万达 万里 马力 马辉 马文瑞 马兴元
 天宝 王平 王诤 王猛 王谦 王震 王一平 王世泰 王必成 王光宇 王秀秀（女）
 王茂全 王林鹤 王国藩 王首道 王恩茂 王超柱 韦国清 尤太忠 毛致用 乌兰夫
 方毅 邓小平 邓颖超（女） 孔原 孔石泉 孔照年 巴桑（女） 叶飞 叶剑英 白如冰
 白栋材 冯铨 司马义·艾买提 邢燕子（女） 吕玉兰（女） 吕正操 乔晓光
 朱光亚 朱穆之 伍修权 任荣 任仲夷 任思忠 刘伟 刘震 刘子厚 刘光涛
 刘兴元 刘伯承 刘建勋 刘春樵 刘锡昌 江华 江礼银 江拥辉 江渭清 池必卿
 安平生 许世友 许家屯 阮泊生 纪登奎 杜义德 杨勇 杨成武 杨易辰 杨得志
 杨静仁 苏静 苏振华 苏毅然 李达 李强 李子元 李井泉 李水清 李世俊 李先念
 李任之 李志民 李启明 李葆华 李瑞山 李德生 肖华 肖克 肖劲光 吴德 吴全清

^{*} 《人民日报》1977年8月21日第3版。



吴桂贤(女) 余秋里 谷牧 希候巴 汪锋 汪东兴 汪明章 宋平 宋时轮 张才千
 张玉华 张平化 张立宪 张廷发 张劲夫 张爱萍 张钰秀 张富贵 张福恒 张鼎丞
 陈云 陈丕显 陈永贵 陈伟达 陈奇涵 陈国栋 陈锡联 陈福汉 陈慕华(女)
 陈璞如 林乎加 林李明 林丽韞(女) 罗青长 罗瑞卿 周纯麟 周建人
 宝日勒岱(女) 宗希云 胡立教 胡耀邦 郝建秀(女) 赵志坚 赵苍璧 赵辛初
 赵紫阳 段君毅 饶兴礼 姚依林 贺诚 秦基伟 耿飚 耿起昌 聂凤智 聂荣臻
 钱之光 钱正英(女) 铁瑛 倪志福 徐向前 郭玉峰 郭沫若 唐克 姬鹏飞 黄华
 黄镇 黄欧东 黄知真 曹里怀 曹轶欧(女) 康世恩 康克清(女) 鹿田计 梁必业
 韩英 韩先楚 彭冲 彭绍辉 覃应机 粟裕 程子华 储江 焦林义 鲁大东 曾绍山
 曾思玉 解学恭 蔡畅(女) 蔡啸 廖汉生 廖志高 廖承志 赛福鼎 谭启龙 谭震林
 樊德玲 薛金达 霍士廉 戴光前

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三十二人

丁长华(女) 七林旺丹 卜谷香 马明 马金花(女) 马思忠 王六生 王扶之
 王君绍 王尚荣 王金山 王金友 王金玲(女) 仁增旺杰 毛信贤(女) 文香兰(女)
 邓华 厉日耐 左崇义 卢忠阳 申茂功 冉桂英(女) 冯占武 冯品德 肉孜·吐尔迪
 吕和 吕存姐(女) 吕需国 朱绍清 向仲华 任质斌 刘西尧 刘志坚 刘明辉
 刘重桂 刘振华 刘维明 刘道生 刘瑞庆 江燮元 关泽海 许彪俊 孙雪梅(女)
 纪英林 杜平 杜学然 杨大易 杨永良 杨俊生 杨富珍(女) 李化民 李巧云(女)
 李成芳 李守林 李坚真(女) 李昌安 李学智 李祖根 李继良 李耀文 肖寒
 肖望东 吴忠 吴火金 吴向必 吴克华 吴冷西 吴金全 岑国荣 邹家华 宋庆友
 沈初云(女) 张震 张令彬 张怀连 张林池 张积慧 张植弟 张耀词 陆金龙
 陈仁甫 陈玉宝 陈永林 陈先瑞 陈作霖 陈爱娥(女) 金明汉 周子健 周阿庆
 郑三生 柳志强 胡松 胡良才 胡金娣(女) 赵兴元 赵学全 赵武成 钟夫翔
 贺晋年 袁宝华 贾那布尔 热地 顾秀莲(女) 钱学森 徐驰 徐立清 郭凤莲(女)
 郭耀卿 高厚良 唐亮 唐克碧(女) 唐闻生(女) 梅松林 黄作珍 黄荣海 黄新廷
 曹思明 盘美英(女) 康林 尉凤英(女) 蒋宝娣(女) 程义太 谢正荣 蔡凤兰(女)
 谭文贞(女) 谭善和 黎原 潘时兴 薛金莲(女) 冀桂昕 戴苏理 魏兴政



历次全会

-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 ⑤ 中央政治局新成员简介
-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九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于8月19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汪东兴

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韦国清 乌兰夫 方毅 邓小平 叶剑英 刘伯承 许世友 纪登奎 苏振华
李先念 李德生 吴德 余秋里 汪东兴 张廷发 陈永贵 陈锡联 耿飚
聂荣臻 倪志福 徐向前 彭冲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慕华(女) 赵紫阳 赛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华国锋 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汪东兴

中央政治局新成员简介^{**}

乌兰夫

蒙古族，1906年12月生，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曾用名云泽、云时雨，1923年12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相当于大学文化，上将军衔。

1923年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投身进步学生运动。入党后不久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毕业后从事翻译工作。1929年回国，任中共西蒙

^{*} 《人民日报》1977年8月22日第1版。

^{**}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工委组织委员、书记。1933年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蒙旗独立旅政治部代主任、党委书记。1938年4月起任中共绥蒙工委委员。1941年8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9月至1943年4月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1942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3年起负责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蒙古族工作。1945年2月起任绥蒙区党委委员，7月起任绥蒙政府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绥蒙政府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主席兼军事部部长，内蒙古军政学院院长，内蒙古自治学院院长，中共内蒙古委员会书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7年5月起任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1948年1月至1949年4月任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5月起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起任内蒙古军区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10月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49年11月至1952年8月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其间：曾兼任内蒙古分局党校校长；1949年12月至1966年8月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1949年12月至1954年6月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其间：1952年6月至1954年3月兼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4月至1954年8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其间：1952年5月起任华北局副书记。1952年8月至1954年3月任中共中央蒙绥分局书记。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3月至1955年7月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1954年9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55年7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1956年7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1956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6年12月起兼任内蒙古大学校长。1960年11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1965年5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关押。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7年6月至1982年4月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1977年8月至1985年9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3月分别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8年5月起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1983年6月至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二届、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12月8日在北京逝世。

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

方毅

汉族，1916年2月生，福建厦门人。曾用名方清洁、方静吉，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中学文化。

在中学读书时参加学生秘密爱国活动。1930年至1934年任厦门、漳州共青团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共青团厦门中心区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1934年底在上海被捕入狱。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经营救出狱，到湖北工作，先后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常委、临时省委农运部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委农运部部长，中共鄂东特委副书记。1939年1月起任中共鄂豫皖区委委员，4月起任中共苏皖省委委员，5月起任津浦路东临时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起任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1940年3月起任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副主任、主任。后任淮南苏皖边区党委委员，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苏皖边区政府第四副主席兼财政厅厅长、中共中央华东局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华东局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第二副主席。1949年8月至1952年3月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3月起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1951年12月至1952年3月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二副书记。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其间：1950年2月起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其间：1953年9月前任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

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2月至1953年11月任上海市副市长，1952年3月至1953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其间：曾兼任上海市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委员、市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3年7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1953年9月至1954年8月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1954年8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越南帮助工作。1954年8月至1961年任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总顾问、经济代表处代表。1961年3月至196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61年4月至1970年6月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其间：1961年3月至1964年6月兼任国家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党组书记，1964年6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64年10月起）。“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0年6月至1977年1月任国家对外经济联络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7年1月至1979年7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79年7月至1981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历任院党组副书记、书记。1977年8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1977年9月至1984年7月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78年3月至1982年5月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兼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80年2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5月至1988年4月任国务委员。1988年4月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月起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党组成员；1992年5月起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党组副书记。1997年10月17日在北京逝世。

中共第八届（八大二次会议增选）、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余秋里

汉族，1914年10月生，江西吉安人。192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初中文化，中将军衔。

1929年参加江西省吉安县农民暴动，后任吉安赤卫队大队战士、分队长、中队长。入党后在吉安永阳军事部工作。1933年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曾在红军大学第四分校学习，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四分校二连政治指导员。1934年任红六军团政治保卫队队长。1935年任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政治委

员。参加了长征。其间，率部任红二军团前卫。1936年11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后转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央军委直属政治处副主任。1938年起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主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干部大队政治委员，一二〇师独立第三支队政治委员，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八团政治委员、团长。1944年起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1945年任晋绥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政治委员，晋绥野战军纵队政治委员。1949年2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军一师政治委员，6月起任第一军副政治委员，后兼任青海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青海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起任中共川西区党委委员、常委，1950年10月起任西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1951年起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52年起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常委。1954年12月至1955年9月任解放军总财务部副部长。1955年9月至1957年5月任总财务部部长。1955年1月至1957年5月任总财务部党委书记。1957年5月至1958年3月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党委第二书记。1958年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石油工业部部长。1958年5月至1965年2月任部党组书记。1959年9月起兼任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工委书记。1964年12月至1970年6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领导中央“小计委”工作。1970年6月至1975年1月任国家计委革委会主任、国家计委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5年1月至1982年5月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1980年3月前兼任国家计委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党组书记。1977年8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9年3月起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1980年2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0年3月至1982年5月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2年5月至1983年6月任国务委员。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其间：1982年10月起任总政治部党委第一书记、书记。1983年6月至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87年11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2月3日在北京逝世。

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耿飚

汉族，1909年8月生，湖南醴陵人，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相当于大学文化。

早年在常宁水口山当矿工。1928年8月起任浏（阳）醴（陵）游击支队小队长。1930年7月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九师参谋、干部教导队队长，红一方面军一师三团参谋长、二师四团团长、九师参谋长、一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入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1936年冬起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参谋后任三八五旅副旅长兼参谋长、政治委员。曾兼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1941年7月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起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通讯处处长。1948年5月起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参谋长。1949年春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6月起任中国驻瑞典大使，中国驻丹麦大使，中国驻芬兰大使。1955年10月至1959年7月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60年1月至1963年8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63年8月起任中国驻缅甸大使，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1971年1月至1979年1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3年8月起）。1977年1月至10月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1978年3月至1982年5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2年5月至1983年6月任国务委员，其间：1981年3月至1982年11月兼任国防部部长。1979年1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其间：1979年1月至1981年7月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1982年9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0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

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9年1月经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



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聂荣臻

汉族，1899年12月生，重庆江津人，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文化，元帅军衔。

1917年考入四川江津县立中学。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在比利时沙洛瓦大学化学工程系读书。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1924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2月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年7月起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派往上海，协助工人纠察队转入秘密活动。1927年7月中旬被周恩来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起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1930年8月至1931年1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其间：1931年1月至3月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委员、参谋长。1931年底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2年3月至1937年8月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1932年4月曾任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参加了长征。其间：曾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红一军政治委员。到达陕北后，1936年4月至12月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年12月至1937年7月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1937年8月至1941年4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委员。1937年11月至1945年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其间：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1943年秋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历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第二书记，平津卫戍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至1954年9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至1950年初）、代总参谋长（1950年初至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至1954年8月），华北军区司令员（至1955年4月）。1949年10月至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4年6月至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4年9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7月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领导原子能事业的三人小组成员。1956年4月至1958年10月任国务院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1956年11月至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10月至1973年7月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58年11月至1967年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59年9月至1969年4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主席。1966年8月至1969年4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69年4月至1975年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75年1月、1978年3月相继当选为第四届、五届（任期至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历任第四届、五届（任期至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1975年2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主席。1977年8月至1985年9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83年6月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7年11月辞去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第一届、二届、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2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

中共第七届、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第八届（八届十一中全会增补）、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央军委委员，194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4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相继任中央军委委员，195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副主席（1975年2月起为中央军委委员、常委、副主席），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副主席，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徐向前

汉族，1901年11月生，山西五台人，原名徐象谦，字子敬，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元帅军衔。

早年在山西国民师范速成班读书，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24年4月入黄埔陆军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排长。1925年参加第一次东征，后任国民军第二军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年冬，任湖南学生团政治指导员，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队长。起义失败后转往海陆丰地区，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十团党代表，四师参谋长、师长。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先后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0年春起任红一军副军长兼红一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长。1931年至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其间：曾兼任红四军军长。1931年11月至1934年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参加了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毛儿盖会议后任右路军总指挥。1935年6月至1937年7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年7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1月起任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37年8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1939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40年底返回延安。1942年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曾兼任联防军参谋长），后任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曾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49年10月至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4年6月至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

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10月至1954年10月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其间：1954年2月前兼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4年9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其间：1959年9月至1969年4月、1975年2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66年1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4年9月、1959年4月相继当选为第一届、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5年1月、1975年1月相继当选为第二届、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8月至1985年9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3月至1980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80年9月至1981年3月任国防部部长。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83年6月至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4年6月至1988年2月任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1988年2月后任名誉会长）。1985年9月辞去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第一届、二届、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

中共第六届（1935年8月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增补）、七届、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第八届（八届十一中全会增补）、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4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4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相继任中央军委委员，195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1966年1月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副主席（1975年2月起为中央军委委员、常委、副主席），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副主席，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彭冲

汉族，1915年3月生，福建漳州人，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参加革命工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



1933年至1937年在福建省漳州市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领导漳州地区学生运动，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县工委组织部部长。1937年至1945年任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宣传队队长，新四军服务团大队党代表，新四军高淳办事处主任，中共安徽省当涂县委书记，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江南指挥部新三团政治处主任，第六师十八旅五十三、五十二团政治处主任，独立团政治委员兼中共江苏省泰州县委书记。1945年至1949年任华东野战军十八旅五十二团政治委员，第六纵队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1949年至1976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台委副书记、省委秘书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龙溪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江苏省南京市市长、中共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三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76年至1983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市政协主席，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上海市市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任职至198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9月补选）、党组副书记。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同月起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2010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

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苏振华

汉族，1912年6月生，湖南平江人，原名苏七生，192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初中文化，海军上将军衔。

早年务农。1928年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30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三军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1934年起任红五师十三团政治委员。1935年起任红四师十二团政治委员。1936年5月入抗日红军大学高级班学习。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起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大队大队长，1938年4月起任第一大队大队长。1940年6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三四三旅政治委员。1940年11月至1941年7月任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兼鲁西军区政治委员。1941年7月至1942年10月任冀鲁豫区党委委员。1941年7月至1942年12月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1942年10月至1944年5月任冀鲁豫区党委常委。1942年12月至1945年10月任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1943年11月至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委员。1944年冀南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后任新的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起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1945年10月至1948年5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任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1949年2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政治委员、兵团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1949年11月至1954年5月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其间：1950年5月至1952年11月兼任贵州省委统战部部长，1950年7月至1952年12月兼任贵州省委党校校长，1953年3月至1954年1月兼任贵州省委城市工委书记。曾兼任贵州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11月至1957年2月任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海军党委副书记，其间：曾兼任海军监察委员会书记。1957年2月至1967年1月任海军政治委员、海军党委副书记、第二书记。1959年9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2年5月至1973年3月任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党委第三书记。1973年3月至1979年2月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海军党委第一书记。1973年8月至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2月至1979年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1976年10月至1979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会主任。1977年8月至1979年2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届、二届、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9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

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1975年2月经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中共十一届一中



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倪志福

汉族，1933年5月生，上海市人，195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6月参加工作，国营六一八厂大专班毕业，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1950年至1953年为上海德泰模型工场学徒，在上海青工政治文化学习班学习、上海第四机械制造训练班学习。1953年至1961年为国营六一八厂五车间钳工。1961年至1963年任国营六一八厂工艺科工程师，进厂大专班学习。1963年至1965年任国营六一八厂技术科工程师。1965年至1973年任国营六一八厂副总工程师、代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73年至1976年任国营六一八厂党委书记，北京市总工会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6年至197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7年至1988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书记，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月起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1988年至1993年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月起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廷发

汉族，1918年4月生，福建沙县人，193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初中文化，空军少将军衔。

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一方面军五军团十二师三十七团三连战士、班长、排长，红三十七团参谋。参加了长征。其间：任红三十七团通信主任。1935年后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司令部参谋、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司令部参谋。1938年1月任东进纵队司令部通信科科长，1938年春任纵队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940年起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轮训

队队长，三八五旅司令部作战股股长，一二九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943年起任太行军区参谋处处长。1944年起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冬起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司令部参谋处处长。1947年起任桐柏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1948年起任中共汉南工委书记、桐柏军区汉南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起任中共襄樊地委书记、襄樊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至1953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兵团第十一军副军长。1953年起任空军第一副参谋长。1958年11月至1962年3月任空军参谋长，1962年3月至1966年9月任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66年9月至1975年10月任空军副司令员，1975年10月至1977年4月任空军政治委员，1977年4月至1985年7月任空军司令员；其间：1960年8月起任空军党委常委，1973年5月起任空军党委第三书记，1975年10月起任空军党委第一书记。1977年8月至1985年9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0年3月25日在北京逝世。

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中共十三大分别增选、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三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同志，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中央委员和候补

^{*} 《人民日报》1978年2月24日第1版。

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

这次中央全会的任务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的胜利召开，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

华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华主席指出，从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以来的半年间，我国的大好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一年初见成效的要求，已经胜利实现，情况比预计的还要好。揭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1978年以来，各方面的形势更加喜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心情舒畅，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一个安定团结、大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已经出现。

华主席指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已先后召开了新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的代表，还召开了政协会议。这些会议的召开和选举结果，很得人心。

华主席说，所有这一切，充分证明，我们的国家已经顺利地渡过了“四人帮”所造成的严重危难，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

华主席说，即将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进一步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大好形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华主席说，五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抓纲治国、达到天下大治的一件大事，也是巩固和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件大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烈地希望我们开好这次大会，全世界也很注意这次大会。我们相信，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经过我们这次全会的工作，五届全国人大和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一定能够开得好，一定能够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华主席的讲话，受到全会热烈的拥护。

全会对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各项文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全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决定提请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全会一致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候选人名单，决定分别提请五届全国人大和五届全国政协会议讨论。

全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新歌词，也决定提请五届人大会议讨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六十九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二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认为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全会讨论了加快农业生产问题 and 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并原则上通过了相应的文件。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会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同志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选举陈云同志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同志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个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一）

全会对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十个月的工作表示满意。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外交政策得到了重大进展。所有这一切，都为全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准备了良好条件。

全会指出，我国在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我国领导人今年内对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柬埔寨、伊朗、缅甸、尼泊尔、菲律宾、孟加拉、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一系列国家的访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完成，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战争危险仍然严重存在，我们必须加强国防，随时准备击退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者。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

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

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打断了，破坏了。此外，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工作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也妨碍了党的工作中心转变的完成。现在，全国范围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虽然少数地区和部门的运动比较落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抓紧进行，不能一刀切，但是就整体来说，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三年、八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党所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能否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能否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这是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大事，对于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二）

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 1956 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

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明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会议认为，这个计划安排是积极的可行的。会议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一九七八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

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

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会议认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许购过头粮。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一九七九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百分之五十，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



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〇年降低百分之十到十五，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一定要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他农产品的销价，也要坚决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予消费者以适当补贴。会议还讨论了加强农业科学教育、制定发展农林牧业的区域规划、建立现代化的农林牧渔业基地、积极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等重要问题，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

全会指出，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同时，我国经济目前还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时不可能很大，必须把有关的情况经常告诉人民，并在人民和青年中继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以身作则。

（三）

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认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会议指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会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

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会议一致认为，采取这些步骤，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表现。

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四）

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



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两年来，通过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纠正了被他们颠倒的许多思想理论是非。但是，现在还有不少同志不敢大胆地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状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同时要坚决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赏罚不明现象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利于人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会议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五）

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

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

全会指出，通过粉碎“四人帮”两年来的努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有了极大的加强，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华国锋同志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和“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号召，已经深入人心。只要全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既勇于创造新的经验，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充分调查研究，实行精心指导，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就一定能够加快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党和人民的胜利前进。

明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全军指战员和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们在明年把工作中心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应有的成就，将是对建国

三十周年的最好献礼。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八十九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八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出席了会议。另有十六名中央机关和地方党委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这次全会，是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前夕，在粉碎“四人帮”三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胜利，在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情况下举行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全会一致通过了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全会认为，叶剑英同志的讲话，高度评价了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同志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功绩，全面回顾了建国三十年来的战斗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所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明确指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努力方向。讲话稿在全会讨论前曾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各民主党派一部分负责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中征求了意见。这是一个对全党全军全国工作有长期指导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它的发表，将极大地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伟目标奋勇前进。

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上通过的这个决定草案，经过九个月来全国范围的学习、讨论和试行，深受亿万农民群众的欢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全会根据全国讨论和试行情况，集中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对决定草案作了必要的修改。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我国农业现状的分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部署，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的，是顺乎民心的。全会相信，这个决定的公布和实行，对广大农村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农村的大好形势，加快农业发展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极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充分发挥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充实党中央的领导力量，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全会通过协商和无记名投票，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十二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准备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请求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赵紫阳同志和中央委员彭真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认为，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习和贯彻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认真学习和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密切结合实际，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批判他们所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肃清流毒和影响，普遍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做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坚决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地为打好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召开。到会中央委员二百零一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八人。另有各地方各部门负责同志三十七人列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由华国锋同志主持。

五中全会的大部分议程是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这部分议程包括：（一）讨论和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二）增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和通过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三）讨论和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四）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全会认为，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外形势都有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始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确定的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广泛地深入人心；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反革命罪行，他们所推行的极左路线和他们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受到进一步的揭发批判；历史上遗留的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党的各项政策在全国广泛地得到落实。在这个基础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实施，艰苦奋斗，使农业、工业、财贸、教育、科学、文化、政法、国防、外交等各条战线上捷报频传，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正在发展。这些事实证明，党中央所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国家已经从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所造成的严重混乱状态，基本上转变成为有领导、有秩序、有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有胜利的条件和信心的局面。这是我们党克服了巨大困难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全会指出：全国各族人民向四个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实践，现在向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不失时机地加以迅速解决的重大问题，包括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随着国内形势的转变，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思想上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需要作相应的解决，以利于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发展和巩固，以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都要求中央委员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决定，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具体时间，由中央政治局决定。

五中全会认为，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必须努力吸收那些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领导工作。这不仅是为了适应现代化事业的繁重工作的需要，而且是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的需要。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并且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两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以姓氏笔划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十一位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会认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增选，中央书记处的建立，是党的重要决策，它表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生机蓬勃，人才辈出。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加强，将对全国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发展巩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全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这个文件，根据全会意见修改以后，即将发到全党广泛讨论，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再加修改，提请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党章修改草案对党员条件规定了严格的要求，同时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完善的规定。党章修改草案总结历史经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需要，对党的干部制度作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包括废止



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

全会讨论和一致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共有十二条，它的草案在一九七九年二月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三月以后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几次修改，由中央政治局再次通过后提交五中全会讨论。全会认为，这十二条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它对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全会决定在会后公布这个《准则》，并在全党执行。全会要求，在贯彻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过程中，结合对党章修改草案的讨论，在全党进行一次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性纪律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对照准则的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凡是违背准则的规定的，必须及时地、切实地纠正过来，个别党组织和某些党员的无组织无纪律、继续闹派性和各行其是的现象，必须彻底改变。全会重申，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就能使全党在中央的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主要议程。全会认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化大革命前夕，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种情况，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近一年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针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同志的各项“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

作，反复核对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详尽确切的审查报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审查报告，据以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全会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这个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会的决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传达，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鼓舞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充满信心地献身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五中全会庄严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的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被反革命阴谋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利用，造成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果。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同时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一一进行平反。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五中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四位同志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严肃而又恰当地处理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反映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愿望。全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本着这一精神，积极负责地继续解决类似的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并教育党员和群众，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密团结，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前途努力奋斗。

全会认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对党政领导提出建议和进行批评，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经验证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即所谓“四大”，不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好方法。“四大”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反而妨碍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为了有利于消除不安定的因素，全会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予以取消。

十一届五中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后的又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最重要保证。会议没有专门讨论经济工作，这是因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举行的全国计划会议，已经制定了一九八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并且在今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以后，李先念同志又在二月十日作了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现在全国经济战线的中心任务，就是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方针，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很明显，一九八〇年全党在各条战线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十分繁重的。完成这些任务，将对胜利召开党的十二大发挥巨大的作用。十一届五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同全国人民在一起，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万众一心，紧张努力，在各条战线上创造出优异的成绩，来迎接党的十二大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四人，列席的五十三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议》；二、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全会之前召开了预备会议，对上述议题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认真的讨论。这次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这次会议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全会认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一、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二、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三、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四、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六、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会认为，经过这次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对于加强中央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和团结一致，保证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充分实现，将起重要的作用。

这次全会充分发扬民主，到会全体同志畅所欲言，在总结历史经验和讨论决定中央领导人选的过程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贯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的精神，恢复和发扬了我们党在延安整风期间形成的优良传统。这次全会生动地表明了我们党的坚强团结，充分地反映了我们事业的兴旺发达。

全会相信，如同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经过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而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那样，这次经过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也必将促进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新的伟大胜利。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决定，今年九月一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一致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交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

全会还讨论并通过了分别给刘伯承同志、蔡畅同志的致敬信。刘伯承同志、蔡畅同志是我们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对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七中全会决定在他们因年高久病，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之际，以全会的名义表达全党同志对他们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

全会正式会议前开了六天的预备会议，就上述议题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认真的讨论。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一百八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二人，列席的二十一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同志、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同志、赵紫阳同志、李先念同志、陈云同志、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热点聚焦

- ⑤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内容特点
- ⑤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能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原因
- ⑤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⑤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 ⑤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 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内容特点*

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主要议程是华国锋的政治报告。报告阐述的内容，既有积极的正确的方面，又有消极的错误的方面。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在阐述这次代表大会担负的重大历史责任时，重申全党要为在 20 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政治报告总结了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指出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反党集团相勾结进行破坏活动。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以后，“四人帮”又继承林彪的衣钵变本加厉地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根本反对“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们使用种种阴谋手法，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报告说，我们的毛主席英明伟大，对“四人帮”多次提出严肃的批评和严厉的警告，亲自领导我们党对他们进行反复的斗争。毛主席逝世，“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急于发难，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中央政治局才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报告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我国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

报告分析了粉碎“四人帮”后的形势和任务，指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有八项战斗任务：第一，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第二，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第三，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第四，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五，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第六，一定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第七，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第八，一定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

* 参见李颖：《从一大到十七大》，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在揭批“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报告错误地肯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其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报告以大量篇幅高度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表示继续沿着“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前进。华国锋的政治报告的重要特点是，既要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长期作乱的“四人帮”，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又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而且要肯定毛泽东晚年提出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为不能辩护的事辩护。这就必然给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拨乱反正设置障碍，危害党的事业。

政治报告肯定这个理论所说的“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在整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政治报告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的完整学说”。这个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这样就会产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的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报告又说，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和消除这个主要危险，必须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政治报告高度赞扬造成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说“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报告还说明：“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报告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这种

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样，政治报告就要求全党继续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去行动。这是非常错误的，是十分有害的。

叶剑英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提交大会审议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代表大会的另一项主要议程。叶剑英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新党章强调全党一定要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党的事业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胜利前进，这是关系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

叶剑英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还指出，新党章把“在二十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写进总纲，是有重要意义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强党的建设。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决不允许任何人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同时又要强调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加强党的纪律；为了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党的纪律，新党章规定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叶剑英的报告还特别指出，新党章要求全党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主要是：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任何特权，同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作坚决的斗争。

党章修改草案报告的上述说明是积极的、正确的。但是，这个报告在某些方面也沿袭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错误提法。提交大会审议的党章修改草案，虽然对十大的党章作了修改，但是还没能从根本上纠正十大党章中的许多“左”倾错误。这就必然给党的建设带来不利的影响。

代表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十一大选出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和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也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在广大党员和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下，把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坚决与“四

人帮”斗争，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同志选进中央领导机构。另一方面，也把有些与“四人帮”斗争并不坚决，而积极推行“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人选进了中央领导机构。相反，有相当一部分坚持与“四人帮”斗争，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老同志本应选进中央领导机构的，却没有被选进中央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在十一大开会时和会后，邓小平、李先念曾多次提议选陈云进中央政治局，许多代表和中央委员拥护邓小平、李先念的提议。但是，因为华国锋不表示支持和同意，因而这个提议未能实现。这表明，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在解决组织问题上，也有其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十一大没有能实现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大的三项主要内容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十一大没能完成的拨乱反正任务，后来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经全党的努力完成了。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能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原因*

（一）客观上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这种限制表现在：第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粉碎“四人帮”仅仅10个月。消除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少同志还不能从理论上弄清马克思主义和“左”倾错误的理论界限，还不能从根本上看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口号的错误所在。第二，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严重束缚着党内许多人的头脑。人们习惯地认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和做过的，从大的方面来看，都是正确的，毋庸置疑。因而，不能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判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看不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还做不到像后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那样，根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实践结果，科学地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的错误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第三，

* 参见李颖：《从一大到十七大》，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一些老革命家和老同志，虽然较早地看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及其严重后果，但是这些同志当时或者还没有被解放出来，对这种涉及全党大是大非的问题得不到发言的机会；或者虽然解放了，参加了领导工作，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的意见对于中央的决策不起主导作用。譬如，老一辈革命家陈云、邓颖超等那时还未参加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工作；邓小平刚刚解放出来，他的正确意见往往不为华国锋所重视和采纳；叶剑英、李先念虽然处于政治局领导成员的地位，但在华国锋、汪东兴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些“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党中央领导不健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妨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贯彻，是党的十一大没能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个客观原因。

（二）从主观指导来说，主要是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继续推行“左”倾理论和政策的后果

华国锋虽然执行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但他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继承和延续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思想。因此，从拨乱反正一开始，华国锋就违背党和人民的意愿，力图全面继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口号，阻挠党内外同志为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当时客观需要的拨乱反正，不仅包括拨林彪、“四人帮”之乱，而且要纠正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三大改造”以后“左”的错误。可是，华国锋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不但不同党和人民一道去进行这种拨乱反正，反而推行并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阻碍拨乱反正。他推行“两个凡是”，并不是要把毛泽东曾经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针发扬光大，而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主要是搞“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左”倾错误全盘延续下来。华国锋在政治上搞三个坚持，即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的形势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华国锋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也是拒绝纠正并延续“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一种表现。

华国锋作为党中央主席，不能站在全党的前头，引导党和人民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进一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反而阻挠人们拨乱反正，这就不能不给当时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带来严重不良影响。事实上，华国锋在十一大的会前和会上，都以他的错误指导思想阻碍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这同党的十一大没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是密切相关的。

在党的十一大召开前，按照华国锋的指导思想起草的政治报告原稿，曾给邓小平看过。当时邓小平还没出来工作，他对许多问题的提法、论述，提了不同意见。譬如，原稿中讲了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关于唯生产力论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专政问题等，其中有些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论点，有些是重复张春桥的谬论。邓小平认为这些错误论点应当拿掉。但华国锋仍然坚持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内从上到下存在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是革命要打击的重点对象。华国锋还坚持“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提法，这是延续了又一个“左”倾错误论点，同张春桥的全面专政论大有相似之处。

在党的十一大的会上，有相当数量的代表，特别是老同志，对华国锋报告的错误观点和他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许多代表说，政治报告讲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种“始终存在”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随之报告又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要加强无产阶级在各个方面的专政，这在理论上也说不上通。

第二，许多代表说，政治报告中关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观点，是不科学的。有些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中的问题，如宗教、资产阶级世界观等等，只能用批评和说服的办法，而不能用压制的、专政的办法去解决。

第三，许多代表说，政治报告对“文化大革命”采取的全盘肯定、高度赞扬的说法，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客观实际的。毛泽东讲过，“文化大革命”



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报告否认“文化大革命”有错误，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毛泽东的说法，应当实事求是地阐明运动的全过程。只有客观地承认“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才能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

第四，许多代表说，过去的中央政治局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有些同志没有表现出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正确路线的精神，是有负全党期望的。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的政治局委员当群众贴大字报批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时，竟然让下面以“反革命罪”把批评他的人抓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次党代表大会，应当十分重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第五，聂荣臻针对政治报告存在沿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口号的错误，作了系统的书面发言，着重讲了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问题。聂荣臻讲的这几个重要问题，原来是邓小平准备在代表大会上讲的，因为邓小平要致闭幕词，就由聂荣臻同志讲了。他表明了老同志坚持原则，反对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不赞成延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口号的原则态度。

尽管十一大的会上，代表们提出这样多的正确的批评意见，但是，华国锋没有接受这些意见，在政治报告定稿时仍然坚持他的一套错误看法，排除了依靠大会代表的集体智慧纠正政治报告中一些重大的错误的可能性。

但是党心民愿不可违，拨乱反正的历史潮流任何人都阻挡不住。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动和支持下，经过艰巨的斗争，终于突破了各种障碍和束缚，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 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九七八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功绩之一，就是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

对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的曲折认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党带领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也标志着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党的中心工作是什么？这是执政党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到中共八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中共八大强调了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在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但是，1956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波匈事件”，特别是1957年中国出现“右派进攻”事件之后，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开始出现了波折。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讨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会上虽有较大争论，但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后，毛泽东的意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再次强调阶级斗争，1969年中共九大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但是在这期间，党内不少

* 陈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北京日报》2008年9月8日第8版。



同志对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着清醒的认识。在逆境中的党内著名理论家张闻天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张闻天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等。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周恩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行了艰难的努力。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为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当时党内的“左”的错误进行了长期的艰难斗争。在1966年中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时，周就为维护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与林彪和江青集团进行了较量，他在与陶铸商量后，提出了“不要把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等主张。在“文革”期间，周恩来始终抓紧全国的工农业生产，针对当时干部不敢抓生产的实际情况，他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同时，又对各种破坏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思潮和错误行为进行了顽强的抵制和斗争，防止了国民经济的崩溃，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1975年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再次向世界宣布：“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可以说，周恩来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支持下，主持了全面整顿工作。他强调把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纲”。要求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还组织理论工作者有力地驳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影响极坏的所谓“唯生产力论”、规章制度是“管、卡、压”、按劳分配是“物质刺激”、讲求经济效益是“利润挂帅”、对外引进是“洋奴哲学”、学习科学文化是“白专道路”等谬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纠正过来，在可能的条件下开始有限度的拨乱反正。全面整顿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国内形势特别是经济形势明显好转，这本来是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的。然而，由于整顿工作在许多方面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势力的利益，不仅遭到江青集团的强烈攻击，而且逐渐为毛泽东所不容，整顿被迫中断。但是关于党的“中心工作”的探索及争论并没有结束。

十年噩梦后，我党历史使命意识的猛醒

党的中心工作发生“文革”中的曲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时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造成的。

由于客观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要求执政党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而当时党和国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路线却偏离了中心任务。这一错位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以严重激化的形态表现出来，这就是1976年爆发的“四五运动”。这是一场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同江青集团进行的较量。但从更深的层次分析，实质是我党和全国人民为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百年历史使命而进行的一场激烈抗争。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抗争虽然受到压制，但党心民心却在凝聚。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经过复杂激烈的斗争，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实现由“革命”到“建设”的伟大历史转折创造了机遇。

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是当时党内历史使命意识猛醒的杰出代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10月12日，胡耀邦就让人转告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的大好时期，并明确地提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1977年5月，华国锋曾强调说：“把我们的国家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变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足以影响上百万人命运甚至国家前途的报道，向全国昭示恢复高考，而恢复高考是为了快出人才，加快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重大战略任务，完成我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更是明确指出：“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

史使命。”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再次强调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党内其他领导人，如李先念在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也都有类似的表示。可以说，强调“中兴伟业”和“伟大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经过“文革”十年噩梦后，其历史使命意识的伟大觉醒。

我党对执政经验的郑重反思

我党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自我纠错意识和强大的自我调整能力的执政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意识和执政责任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反思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大问题。1978年5月在党内及理论界开展起来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一场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关系整个中国政治大局，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进而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作思想理论准备的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我党开始对自己执政及如何执政进行认真的反思。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回国。在东北各城市及天津、河北唐山等地，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北方谈话”。他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从执政的高度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他强调：“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这次北方之行的多次讲话，集中地反映了他在历史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其重要观点后来形成成为第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也就是实际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的主要内容。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也指出许多同志对“从经济基础到上

层建筑的深刻革命”思想准备不足。说这些人“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进一步。”他继续说：“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来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陈云也尖锐地指出当时的情况，他说：“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从以上言论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执政30年的认真反思。可以说，经过这种反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思路已经清晰，这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以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依据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要通过改革开放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历史转折

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首先要搞清楚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基本国情及其社会主要矛盾，以此来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这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和安排问题，而是关系到战略全局和战略方向的大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问题的认识水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中央工作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讨论了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这次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会议上，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提出质疑，认为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许多与会者在讲话中指出：从历史考察，工作重心应当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本来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就应该开始这个转移。经过认真、郑重的讨论，全会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党的八大已经提出却一直没有完成的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从而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认识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已经走出 20 年“左”倾错误的误区，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这就为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总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折。就这样，我党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开始形成，并付诸实施。从此，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始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改革开放作为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其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一是从我国自身情况看，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二是从外部情况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因此，30 年前，是严酷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这是一种被迫的选择，然而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一、“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1956 年党的八大对于如何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从 1957 年开始，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次遭受重大挫折。“左”的错误不断积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文化大革命”历时 10 年之久，名义上是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严重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

^{*} 曹普：《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学习时报》2008 年 9 月 29 日第 3 版；《学习时报》2008 年 10 月 6 日第 3 版。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图景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是一副怎样的图景呢？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10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

“文化大革命”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

重破坏。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1]。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2]一个20多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1角1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1角3分钱，

[1] 曾培炎：《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897—898页。

[2] 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有2.7亿人每天能挣1角4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邓小平打出的沉重“问号”

我们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大家看，“文革”时期搞的这种社会主义，难道就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所要追求的那个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如此体现的吗？按照这样的社会主义继续发展下去，社会主义还有吸引力、号召力、凝聚力吗？人民能答应吗？中国还有希望吗？每一个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邓小平更是如此。从第三次复出伊始，他就对“文革”这样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这种“优越性”打出了沉重的问号。1977年12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他尖锐地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197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他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二十八年只搞了两千三百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也是发出了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信号。社会主义绝不能够再像“文革”这样搞下去了，中国再也不能像“文革”这样折腾下去了。

二、中外经济科技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中国面临巨大压力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中国相继发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一个接着一个，西方世界、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又在干什么呢？又是怎样一副图景呢？



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

新科技革命，也称作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兴起于二战以后的美国。这次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二战期间积累的本来服从于战争需要的军事技术转移到民用上来，使得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尖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在原子能技术方面，1945年7月，美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1957年，美国西屋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压水堆型商用核电站，苏联以及英法等国也相继建成了核电站。核电站作为一种新能源，开始迅速发展。在信息技术方面，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电脑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1958年出现了晶体管计算机。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每秒运算千万次的集成电路，即第三代计算机。1971年世界上第一台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做芯片的微型计算机在美国制成。在超大型计算机发展的同时，微型计算机和微处理机，家庭和个人用电脑迅速发展。在空间技术方面，1957年10月4日、11月3日，苏联相继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此后，美、苏两国开始了激烈的太空竞争。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月，1981年4月，“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又成功发射。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美国科学家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DNA重组实验；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此外，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等也迅速发展。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美欧日经济实力的大发展、大提升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从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连续上升了106个月，6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繁荣的十年”。1975年，美国GDP总额达到15265亿美元，是1957年的3.2倍。从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间，西德GDP增加了5倍多，是除日本之外发展最快的西方国家。1951—1970年，法国工业年均增长5.9%，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09亿美元。日本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1955年，日本编制《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年）；1960年，又实施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

均增长 8.5%，1960-1965 年为 9.8%，1965-1970 年为 11.8%。从 1955-1970 年，日本 GDP 增长了 7.2 倍。日本、美国、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 1973 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20 世纪 50 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但在随后的 20 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 80 年代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山东。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 年进出口总额达到 196 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只有 148 亿美元^[1]。

巨大的差距与震撼

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认知，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通过出国考察访问实现的。“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 1978 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重要的考察团包括：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其中西欧五国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 1978 年 5 月 2 日出发，6 月 6 日回国，行程 36 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 5000 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 2000 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 16 万工人，相差 80 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 2.5 万千瓦，职工只有 12 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 2.6 万千瓦，职工却有 298 人，高出 20 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 350 万吨钢只需 7000 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 230 万吨，却需要 67000 工人，相差 14.5 倍；法国戴高乐机场，1 分钟起落 1 架飞机，1 小时 60 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 1 架，1 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 20 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

[1] 《港澳经济考察报告》，1978 年 5 月 31 日。

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1]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1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我们“实在觉得很寒碜”。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开会，专门听取了访日团、港澳团和西欧五国团的汇报。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获得的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大家无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党再不调整政策，另寻出路，改革开放，奋起直追，真是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愧对时代了！

三、“再不实行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85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曾说：“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人行不行，还要看这十亿人口怎么做。”建国以后几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人做得怎么样呢？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做得怎么样呢？中国的社会主义表现得如何呢？应该说，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最终结果看，距离应该和可以达到的目标，还差很远的路程。但新的契机终于到来了。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粉碎，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获得了重新出发的重大转机。面对这样的转机，中国再也不能失却也不容失却了。

[1] 宋晓明、刘蔚：《追寻1978——中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58页。

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就成为中国告别过去，开创未来，开辟新时期新道路新天地，解决当时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关键中的关键。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激烈交锋，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有力支持，批评“两个凡是”的主张，公开支持《实》文的观点，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人也表态支持这场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含台湾）中，有27个省、市的党政领导先后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不赞成“两个凡是”，从而造成了真理标准讨论的不败之势。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贡献和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重新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了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把人们从毛泽东晚年错误、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等一系列新政策、新主张、新思想、新办法的提出，打开了通道，提供了思想空间和条件。

改革开放的初步“酝酿”

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不断深入，伴随着思想“坚冰”的打破，改革开放也开始酝酿了，并逐渐成为共识。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研究如何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会议开了两个月零三天，提出的新办法、新路子，集中起来，就是一条：改革开放。会议期间，袁宝华、张劲夫、胡乔木等36位同志发言；李一氓、谷牧分别介绍了考察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西欧五国的情况；姚依林在发言中引用列宁的话，提出“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都给与会者很大启发。会议结束时，李先念作总结讲话，提出“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同时提出：“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

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1]这次务虚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决策层唯一一次用如此长的时间集中地、大规模地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会议，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期间，邓小平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改革开放问题。1978年6月、10月，在会见罗马尼亚和西德客人时，邓小平指出：“我们派了许多代表团到欧洲和日本去考察，发现我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很多，许多国家都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不苛刻，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们都有利，为什么不干呢？”“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在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中，邓小平提出：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这时候，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也由邓小平首先提出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

真理标准讨论热烈开展半年多了，改革开放开始酝酿了，工作重点转移也提出来了，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将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只是酝酿，到底改不改、开不开；工作重点转移虽已提出，到底转不转移，何时转移；真理标准讨论究竟谁是谁非，等等，对这些重大问题，从党中央来说，都还没有做出正式结论和决定，都属“悬而未决”。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农业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等，也需要研究。这样，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也就是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并做出正式结论和决定的必要性、紧迫性就提出来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一个眼前的、现实的背景。

按照我们党的惯例，在召开中央全会之前，往往要先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就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统一认识，为全会召开做准备。这样，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就先行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开得一波三折，取得的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一致赞成从1979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

[1] 引自《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

经济建设上来；二是为天安门事件等7个重大历史遗留案件平反；三是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批评了“两个凡是”；四是进行中央人事问题酝酿等。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召开的。由于前期作了充分准备，这次全会只开了5天就结束了。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有了这三个“拨乱反正”做基础和保障，再有了前面的一系列酝酿和准备，全会正式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策就水到渠成了。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1]公报中虽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四个字，但这一段话，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绝非历史的“偶然”，更不是某个人的“臆想”，而是中国发展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大势使然，是“内忧外压”的形势所逼迫出来的。当然，这个选择本身也经过了较量和斗争。在做出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顽强生机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正是因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中国社会才在此后的3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试想：如果当初不作这样的选择，或者作出别样的选择，继续闭关锁国，继续固步自封，继续陷在僵化封闭的“左”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与世界发展的潮流相脱节，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相背离——现在的中国，会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呢？现在中国社会的面貌，会是一副怎样的面貌呢？现在中国十几亿的老百姓，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一个伟大事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往往随着岁月的推移、历史的前进而不断显示出来。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是我党和国家历史上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在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我们党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重大的成就，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也经历过很多艰辛和曲折，甚至包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付出了沉重代价。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举国欢腾，春潮涌动，人心思变，百业待举，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追赶时代前进潮流。但是，这种要求和愿望却遇到严重阻碍，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是“文革”后的“左”倾错误理论的集中体现，是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考验：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抓纲治国”，还是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辟新道路。

^{*} 黄中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新湘评论》2008年第7期。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复出，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教育、科学、文艺成为拨乱反正的最早突破领域，使广大干部群众在困惑和期待中看到希望。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理论。他们认为，中国要前进，必须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当天晚上，新华社向全国全文播发；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全文转载和转发。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从解决思想路线这个根本问题着手，明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支持和领导从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是讨论经济工作。中央工作会议前，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决定，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陈云同志在分组讨论中提出要系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响应，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重大错案平反的决定。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发言。在这篇讲话中，针对“文革”结束后思想上“左”的束缚和行动上的徘徊，他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解放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和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特别在对于人们极其关注的怎样看待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

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邓小平同志这篇著名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起了关键作用。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这个重大历史关头所召开的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的光辉篇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议。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党和国家命运攸关的历史性抉择。

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全会重新确立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回顾党的历史，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和延安整风中为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有中国特色的具体道路，引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成就都是继续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结果，我们的失误则是背离这条思想路线的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破坏的状况达到极致。“两个凡是”则是这种状况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某种延续。十一届三中全会继承延安整风的传统和智慧，批判了“两

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为我们党恢复和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就要求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党的八大明确提出要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此后我们的失误，归根到底，就是抛开了八大路线，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重申了毛泽东1957年作出的中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对八大正确路线的恢复和发展，使我们党能够继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大推进由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开始的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指出，党的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实事求是地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会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着重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建立起来，这是组织路线拨乱反正最重要的成果，使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有了组织的保证。

这次全会还讨论了经济建设问题。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全会提出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注意量力而行，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要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等问题出发，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就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我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明确的界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界定，包括党的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and 我国发展的奋斗目标。其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总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遵循，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邓小平同志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从国内来说，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他又说过：改革包括对外开放在内。全会实行改革开放这一决策极大地激发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创造活力，于是有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有了经济特区的创建，有了城市改革从最初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同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我们党又旗帜鲜明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为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构成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这就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实践创造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自觉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是开创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离我们最近的重大理论成果，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和阶段性成果的内在统一。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从十二大到十三大，这一理论逐步展开，十三大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相联系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从十三大到十四大，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标志，这个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的行动指南。十六大科学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将这一重大理论成果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统一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每一步发展都呼唤着理论创新，党的理论每一次创新都推动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天地。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党在新时期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历史，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形成发展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年，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活动的三十年。

正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

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我们才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华民族沧桑巨变，摆脱了贫困，告别了落后，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如果说，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和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那么，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和正在随着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并将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部进程。今天，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的最好纪念，就是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努力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不仅在于它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而且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邓小平理论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展开的。在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作了集中的论述。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他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形成科学的体系。但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就对这个问题开始了深邃的思考，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新观点。后来的那些论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因此，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研究邓小平在这前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

^{*} 郭德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上海党史与党建》1998年第6期。

主义问题的思考。

一、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

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批判“四人帮”所谓的“穷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对中国与世界各国差距拉大的忧虑开始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等谬论，造成恶劣的影响。而在我国大搞阶级斗争，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在全世界兴起。利用这次技术革命，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打击、经济非常困难的西德、日本等国，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大国。亚洲的“四小龙”也抓住这次机遇，实现了经济的起飞。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国不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同周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也迅速拉大了。这种强烈的对比，使邓小平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感到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下去了，并开始思索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当时邓小平考虑的重点，首先是怎么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1978年9月，他在访朝归来视察东北三省时就到处讲：“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9月16日，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又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入落后不行。现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由此可见，他是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想到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1978年10月下旬开始,邓小平连续出访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他在日本期间,以极大的兴趣参观工厂企业,考察日本经济,了解到日产汽车制造厂的劳动生产率比我国的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当他坐上日本的高速列车时,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对这些国家的访问,更增加了他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使他更加明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不能是贫穷的,而应该是富强的,它的优越性就表现在比资本主义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因此,1979年11月26日他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更加明确地提出:我们“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种看法,与过去长时期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只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为了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邓小平领导全党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随着历史经验的总结,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思索更加深入了。1980年4月1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5月5日,他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在这里,连“社会主义的本质”、“生产力标准”,都明确地提出来了。这说明,邓小平这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已经深入到了社会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上。

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就要弄清楚中国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什么特点,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也作出了新的思考。1978年9月他在视察东北三省时就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国、穷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在这样

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他又于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980年4月21日他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谈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又说：“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正是根据这种思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个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萌芽。可以说，邓小平这时已经有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不能离开这个现实，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

对于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也作出了新的思考。1979年12月6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他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千美元。后来他又提出，这个目标实现以后，还要再花30年到5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在政治上要发展民主，加强法制，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思想文化上，他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79年10月30日，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后来，他又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目标。总之，他认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的社会主义，应该是经济上得到比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富裕；政治上有充分的民主、健全的法制；思想文化上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

这些思想，与过去我们长时期中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很不相同的，它既是适应时代变化的特点的，又是切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从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后来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二、邓小平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在中国这样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有很多方面实质上也是谈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除了上面谈到的以外，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还作了很多新的思考和探讨。

1.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周边国家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从 70 年代以来的发展的停滞，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教训，都使邓小平感到必须突破苏联模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因此，1979 年 3 月 30 日，他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那么，怎么才能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呢？邓小平指出，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 1977 年 7 月恢复工作以后，他就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978 年 12 月 13 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样，就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统一了起来。

在这同时，邓小平还强调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尊重群众的

创造精神。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受到压制的时候，他立即给予有力的支持，从而使这场讨论冲破重重阻碍，得以在全国普遍地开展起来，形成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当家庭联产承包农业生产责任制遭到非议的时候，他也给予坚决的支持，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正是在他的有力支持下，家庭联产承包农业生产责任制才得以顺利地推广开来，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带动了其他方面改革的进行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

2. 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党的中心工作。在一个长时期中，中国共产党一直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9月邓小平在访朝归来视察东北三省时，就明确提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年年底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又提出要先讨论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正是根据他的这个建议，会议一致决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使这次原计划主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一般性的会议，开成了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为了确保这条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确地分析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复地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要性。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并认为这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进行，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他还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发展生产力提到“革命”的高度，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这是对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的

重要性的最深刻的说明。正是因为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才使经济建设得以避免各种干扰，保证了它的顺利进行。

3.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过去，我们在长时期中把阶级斗争看作社会主义的动力，一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邓小平则把改革看作社会主义的动力。1978年10月19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改革的任务，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改革的必要性，认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为了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他提出要改革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如扩大地方、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实行生产责任制，允许一部分地区、企业、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等一系列办法和措施。

在强调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邓小平还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1978年10月19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提出要多方面地“改变上层建筑”，实际上就是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又集中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这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宣言书。其中的许多深刻思想，至今



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把握时代的特点、世界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面临的主要问题。邓小平在对国际形势作了深入分析之后认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因此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学习他们的长处。1978年5月谷牧率团出访西欧五国时，邓小平就指示他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据谷牧说，邓小平这时对外开放的思想已经明确了，考虑的是如何对外开放的问题。9月16日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现在已经有了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因此要充分加以利用，“关起门来不行”。10月10日，他在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谈话时进一步提出：要“实行开放政策”，“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1979年11月26日，他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谈话时再次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在应该利用起来。”正是在他的倡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对外开放的决策，并随后决定设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迅速取得明显成效。

5. 关于发展经济的途径和手段。在这方面，邓小平提出两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一个是发展市场经济，一个是重视科学和教育。关于发展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首次提出来的，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

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这里，对于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专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都说得很明确了，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概念也明确地提出来了。他当时虽然仍主张以计划经济为主，这个思想也没有立即被中央所采纳，但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为后来确定市场经济的模式提供了一个最早的思想准备。

关于科学和教育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早在1977年就提出来了。这年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此后，他自告奋勇抓科学和教育，并反复强调科学和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8年3月18日，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还旗帜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为了调动科学和教育人才的积极性，他大胆地推翻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加给教育战线的错误的“两个估计”，认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的这些思想，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6.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和领导力量。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怀疑甚至否定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右的思潮，专门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加上原来所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后来形成的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特征的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这时已经基本上提出来了。

在这四项基本原则之中，邓小平特别重视坚持党的领导。他说：“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我多次讲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这是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但他同时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改进党的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的纪律。其中，搞好党风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则是其中最根本的措施。1980年8月18日他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实质上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党的领导。他认为，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他的这些思想，都是非常新鲜的，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指明了方向。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邓小平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也是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取得重大进展和突出成就的时期。正是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理论开始产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开辟。这些思考虽然还不够全面、系统和完善，还需要进一步丰富、补充和发展，但毫无疑问，它为后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重要决议

-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 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
- 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通过)

刘少奇同志，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一九二〇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撤销了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和实际上撤销了他的国家主席的职务。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十一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68〕152号和〔68〕155号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刘少奇同志本人，早在一九六六年冬即被隔离和批斗。在整个隔离、批斗过程中，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一九六九年十月，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迫害含冤逝世。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同志案件进行复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后，中央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同志一案进行复查。现在，这个案件的问题已经逐项调查核实。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查后，特将复查结果与决议宣布如下：

（一）所谓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问题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十二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后，“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据复查，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五年冬在长沙曾经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和投敌叛变的问题。

第一，刘少奇同志确是因病重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当时，《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广东《工人之路》等革命报刊及长沙《大公报》，对此均有报道。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的情报上，也提到“刘华（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说：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的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所谓“借口养病”、“私自潜逃”之说，起初是原专案组歪曲报刊材料，推断强加的；后来又仅凭康生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写给江青的亲笔信上一段话（诬陷说此事他“完全可以证明”），便予以肯定。这不但无任何旁证，而且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就电请赵恒惕“查明释放”的事实，也足以证明“潜逃”之说完全是虚构的。

第二，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确是经过多方营救获释，由湖南转去广州工作的。据查，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工会，以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同时，刘的亲友、同乡托请湖南上层人物洪赓飏（长沙禁烟局局长，刘少奇同志旧友，叶开鑫的干女婿）、叶开鑫、贺耀组（均为赵恒惕手下的师长）、欧阳振声（湖南省议会议长）等人，以同乡身份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内有上层疏通和联名具保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将刘少奇同志开释，驱逐出境了事。此后，刘少奇同志在二月十九日抵达广州，还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隆重欢迎。这段经历，当时《工人之路》、《中国学生》等革命报刊均有报道，并有袁素（洪赓飏之妻）、李治安（刘少奇同志前妻何宝珍烈士的同学）等人证明。

第三，刘少奇同志在被捕期间，并无任何投敌叛变的言行。原审查报告认定为“投降”、“背叛”的唯一根据，是恶霸罪犯杨剑雄（当时任湖南省长署会计）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当洪赓飏，叶开鑫等具禀，保释刘少奇同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交保开释’。”这段话，只能证明刘少奇同志确是经保释后被驱逐出境，原专案组引来作为他接受“活命条件”和“投降”、“背叛”的根据，是荒唐的。至于赵恒惕这样的旧军阀送《四书》的事，在当时封建军阀统治的历史条件下，不足为奇。这件事，连当时报纸的报道也认为是“最滑稽”的。原审查报告脱离历史背景，不顾历史事实，从赵恒惕送《四书》竟推断出刘少奇同志“奉赵恒惕旨意……重新钻入党内”，纯属捏造和诬陷。

第四，原审查报告还提到，赵恒惕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和十月杀害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同志两件事，以推断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如不投降必然被杀。据查，“四斩”布告，是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针对六月初长沙市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工人，群情激愤，惹起“一夜纷乱”，怕引起更大暴乱而发布的。黄静源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在江西省安源煤矿被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杀害的；事后，工人群众将其遗体抢到长沙，举行送葬示威和追悼大会。这些事同后来刘少奇同志被捕和释放并不相干。如不投降必然被杀这一论断

是没有根据的。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刘少奇同志“斩决”，仅来自黎泽泰（当时任湖南省长署文牍）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逼供之下写的材料，而按他所写，他也是听杨剑雄说的，并非亲自看到，更何况杨剑雄的口供中，根本未提到赵恒惕亲批“斩决”的事，不足为凭。

第五，原审查报告还借杨剑雄一九五三年被处决之前，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曾请示过刘少奇同志一事，认定刘少奇同志“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杀人灭口”。这完全是歪曲事实。

杨剑雄是恶霸地主，历史上有血债，民愤极大，解放后畏罪潜逃外地，一九五二年逮捕归案。宁乡县人民政府根据其罪恶事实，在刘少奇同志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判处杨犯死刑，并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于一月二十四日核准。由于审讯过程中，杨犯说过他曾经参加一九二四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的营救活动，宁乡县公安局为慎重起见，才在执行前（一月二十六日）致函刘少奇同志进行核对，并要求在十日内电复。刘少奇同志于一月二十九日复电说明，杨剑雄“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这个答复意见是正常的，并未对杨犯的判决有所干预。整个过程表明，宁乡县判处恶霸杨剑雄死刑，事前刘少奇同志完全不知道。如果这是出于刘的授意，宁乡县又何必在判决后再致函询问呢？！原专案组把这件事说成刘少奇同志蓄意“杀人灭口”，完全是强加罪名。何况已有充分材料证明，刘少奇同志根本没有投敌叛变，当然更不存在他害怕暴露“罪行”而“杀人灭口”的问题。

（二）所谓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和庐山进行“内奸活动”问题

原审查报告认定，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紧要关头，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位，充当内奸，破坏工人运动。列举的“罪名”是：

1. 在“四·三”惨案发生后，为日寇保镖；
2. 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敌人献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解散工人纠察队；
3. 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还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
4. 在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据

复查，这些罪名都与事实不符，或是诬陷，或是虚构，不能成立。

第一，“四·三”惨案问题。据查，在驻汉口日本水兵杀人惨案发生后，刘少奇同志代表工会出席各人民团体紧急会议和参与主持工会联席会议，在组织群众反日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对此，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汉口民国日报》曾有报道。各工会联席会议的决议和全省总工会的布告中，号召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不要打日本人”等，经查阅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等历史档案，这是根据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制定，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决定的。原审查报告不问来由，颠倒是非，把这些当时见报的文告词句，拼凑成刘少奇同志“为日寇保镖”的罪名，显然是蓄意歪曲历史。

第二，所谓“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以及‘向陈公博献策’的问题。这一条，出自丁觉群（当时是共产党员，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一九二八年被捕以后脱党，参加过复兴社，已于一九七八年初病死）一人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的“书面交代”，并无其他证据。经查对原专案组审讯丁觉群的档案，发现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在“监护”中交出一份笔供，附信公开说明：“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同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丁四次翻供和申述，在十一月十三日的申述中特别提到：“首长已经向我揭开了盖子，反戈一击有功，且可免追既往罪过，否则交群众斗争，交公安机关治罪，停止退休金，以至促短自己有限生命，而落个遗臭万年。聆训后，我思想斗争剧烈，思想起伏，终夜无眠。”丁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的“书面交代”，就是在这之后，按照原专案组的提示编造的。又查到一九七二年丁被释放回家后的日记，其中写道：“我只说在党内我受刘的领导，而不提陈独秀当权的党中央对我的指示，和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对我面示，就是使刘贼无所躲闪，而我自己情愿把一切担负起来。”丁的儿子丁运隆交出这本日记时说明，其父生前对他说过：“我深深地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由此可以完全证明，丁觉群的口供是被迫编造的。又据调查，这个一名组长、一名组员（丁觉群）的所谓“工人运动小组”，

根本就不存在。既然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机构，当然刘少奇同志被指定为小组长是虚构的。这也证明，丁觉群的“书面交代”是捏造的。

第三，调动武汉工会干部问题。据李维汉、郭述申同志及李景明（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郑超麟（当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等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初，我党中央鉴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步骤逐渐明显，遂决定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湖北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又新调一些面目未暴露的干部来坚持工作。这种应变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原审查报告将此事歪曲为刘少奇同志“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是十分荒谬的。

第四，工人纠察队缴枪问题。经查阅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陈独秀等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这些有关材料都说明：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屈服于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压力，为维持国共合作和所谓“兵、工团结”，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这个错误是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主要责任在中央的领导。刘少奇同志当时并非中央主要成员，凡是了解这一段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重要的问题，绝不是他所能决定的。至于他作为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代表工会去作缴枪经过和意义的报告，完全是执行上级的错误决定的问题。原审查报告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把它又演绎成“特务内奸活动”，则显然是栽赃诬陷。

第五，是否有所谓“苦肉计”，即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曾否被捕的问题。1. 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两处是隔壁）工作的林棣之、陈仲波、曾昭美、吴良福等多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有一些国民党军队冲进全总和省总闹事，但没有见到和听说发生过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刘少奇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的事。2.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一方面提到纠察队解散以后，发生了军队占工会房子，抓了工会的人；另一方面又提到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兵保护他们，等等。这里所说的“抓工会的人”一事，显然不是指刘少奇同志等全总和省总的

主要领导人。如果当时刘少奇同志已经被捕，当然就不会有李立三、刘少奇同志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求保护的事。3. 当时的《庸报》、《申报》、《时报》、《顺天时报》等，有关这次军队一度“占领总工会会址”，与工会发生纠纷的报道，不仅没有提到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而且有的说：“经苏兆征与第八军李品仙交涉结果，此事乃双方意见有欠疏通之故，现经谈妥，军队已于午后撤退”（申报）；有的说，“……今晨军队占领工会会所事，经双方解释，误会全祛。今晚军队已撤去，工会仍归纠察队防守”（庸报）。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曾经被捕，主要根据是：当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报告信。信上提到：昨晚卫戍司令部军官率领巡逻队，在总工会办事处逮捕了该会几个重要成员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项英等。从上述各方面的材料，特别是与一些当时亲历其境者的证明相对照，该报告信的内容显然是不真实的。而且事实上向忠发、许白昊、项英等当时也都未被捕，更足以证明该报告信内容之不真实。

至于所谓假逮捕的“苦肉计”之说，其唯一来源是前面提到的丁觉群的那份虚构的“书面交代”。（据丁交代：刘少奇为了掩盖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将来更好地为汪效劳，于六月二十五日写一封密信，要丁送给陈公博，提出“来一次苦肉计”。在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刘少奇等人即被逮捕。次日上午由卫戍区司令部用小汽车密送刘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可是，大量事实已经确切证明，刘少奇同志并未被捕。既未被捕，何来“苦肉计”？！原审查报告引用这种在逼供下编造的谎言，滥定罪名，完全不足为据。

第六，所谓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问题，原审查报告仍是以丁觉群编造的那份“书面交代”为依据，别无任何旁证。而据聂荣臻同志以及罗章龙等人证明，当时党中央是知道刘少奇同志从武汉去庐山养病的；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前几天，聂荣臻同志还曾经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两次到庐山向刘少奇同志当面传达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这说明，丁觉群的口供所说“躲往庐山”根本不能成立。

（三）所谓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问题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

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省委领导成员和所属党组织，并且向统治阶级“积极出谋献策”，张学良“颇为赞赏”，因而释放；由于他提供情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还说 he 按照敌人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等。经复查，这些“罪名”都是无中生有的伪造。

第一，原专案组认定刘少奇同志在沈阳“被捕叛变”，主要是根据孟用潜（当时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与刘同时被捕）、刘多荃（当时是张学良的卫队上校团长）二人的交代材料。现已查明，孟用潜同志早在刘少奇问题定案前就提出翻案（他在被关押期间，共写过二十次申诉材料，均被原专案组扣压，隐瞒不上报），纠正了原来在逼供情况下编造的假交代。刘多荃的材料也完全是虚构的。经查对原专案组案卷记录，刘多荃所说的“破获共产党案子”，从被捕人数、被捕地点、关押时间，到释放的方式和过程等具体情节，同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案情无一相似之处。刘多荃也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和十一月写了更正材料，说他确实没有听说过张学良同被捕的人“达成政治交易”的事，“一九六八年一月我所交待的关于‘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人案’和同年八月以前所交待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两篇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并揭发了专案人员对他指供、诱供，炮制假证据的全部过程。原审查报告，把刘多荃被逼虚构的证词，作为刘少奇同志“叛变”的根据，是毫无道理的。

第二，原《罪证》中还有另外六个所谓“知情人”作证的笔供，都写得含糊不清，除一份是“听（别人）说”的之外，其余五份，只说被捕者是黑脸、白脸、黄脸、中等个、高个子或胖子、瘦子。这些“知情人”中，关辅金（原奉天纱厂副技师）、徐廉奎（原奉天纱厂庶务主任）、关庆云（原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代理科长）三人已病死；还活着的丁基实（即丁君羊，在孟用潜同志调离后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后脱党）、刘青第（原奉天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和陈元桢（原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差遣班长）三人，都否认了在逼供情况下写的假证词。陈元桢（现名陈冠英）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揭发（由他三儿媳代笔）说：他只记得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因闹风波，抓过人，“以后的事情我就知道了”。但是，一九六八年一二月间，沈阳军区有一个人把他叫去查问此事，威胁说，“你在（再）不说，就送你到公安局去”。“前后七八天连轴转，不让我睡觉，……实



在受不了”。后来又换来另一个人，“对我说，那你们都承认了吧。刘少奇已经倒了，没有啥，你立功了”。“一九六八年的那个材料是他们写的，我不认几个字，不会写字，未让我看，只念给我听一下，就让我签字盖手印的，随之就把我放回家了”。不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前不久），……把我带到吉林军区监护了起来”，起初“听说开完‘九大’了让我回家”，可是“一九七二年二月才把我放回来”。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专案人员如何搞逼供信和弄虚作假，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除了以上虚构的证词已被否定之外，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被捕，并无任何叛变行为。

（1）现已查明，刘少奇同志是在奉天纱厂一次工潮中，同孟用潜同志一起去该厂找工人谈话，因厂内有叛徒向厂方密告厂内酝酿罢工的情况，致使地下党支部书记被拘留，刘、孟二人也在纱厂门口被该厂卫队怀疑而逮捕。以上被捕的经过和原因，满洲省委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即向中央作了报告，有案可查。廖如愿（当时任满洲省委秘书长）也证明：“刘、孟到警察局后，外面送东西很方便，前往接见也不困难”，对刘、孟“没有作政治犯处理”，“所以当时省委态度镇静”；“刘、孟在警察局集中意志对警察局所作一般案件的应付，没听到政治态度有什么变动”。

（2）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并未引起党组织受破坏和牵连其他同志被捕、被杀。据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说：“刘、孟被捕事，在工作上虽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倾向上没有多大的影响。”王鹤寿、杨一辰、何松亭等同志（当时均在满洲党、团省委及所属组织工作，是真正了解情况的）也都证明，刘、孟被捕后，他们所知道的党、团领导机关与负责同志的住址、他们所知道的一些学校、工厂的支部，没有一处遭到破坏，也没有任何一位同志受牵连被捕；王鹤寿、赵毅敏等同志还证明，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除一位鼓动兵变的共产党员韩渊波同志被杀以外，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地区没有任何同志被杀。这个历史事实，也是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同志人所共知的。原审查报告说由于刘少奇同志被捕，有许多共产党员被杀，这完全是捏造的。

（3）原审查报告影射一九三〇年四月满洲省委大破坏，是刘少奇同志“提供

情报”的结果。这是蓄意歪曲历史。根据党的历史档案（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中共满洲总行委第十二号《通知》）和敌伪档案（一九三四年日本大阪对支经济联盟编《苏联和满洲的共产运动》）、敌伪报刊（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盛京时报》）记载，以及上述当时在满洲党、团省委工作的赵毅敏、杨一辰、王鹤寿等同志一致证明，这次大破坏，致使党、团省委领导人及党、团员三十余人被捕，是由于杜兰亭（当时在团省委工作）四月十二日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团省委机关的地址造成的（当时党、团省委负责同志正在那里开会，许多同志因而被捕）。当时刘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满洲去上海工作，这件事同他毫无关系。

（4）刘少奇同志是在被捕半个多月后，统治阶级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取保释放的。据孟用潜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补充材料”说：“对我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对刘少奇也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杨一辰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和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两次证明，当时对刘少奇同志判决“检察却下，不起诉处分，取保释放”。还有饶漱石（当时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等人，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明材料。

总之，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没有暴露政治身份，没有损害党的组织和党的事业，关押半个多月后，因案情不重，证据不足，即取保释放，继续从事党的领导工作，根本不存在投敌叛变的问题。原专案组仅凭搞逼供信编造的材料，就认定刘少奇同志“投敌叛变”，进而凭空捏造说：“刘少奇积极地向……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被杀”，“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大叛卖”活动。这些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罪名”。

（四）所谓“其他反革命罪行”问题

原审查报告在以上三个问题之外，还列举了刘少奇同志的七项“反革命罪行”。经复查，这些“罪行”也都不能成立。

（1）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的问题，已由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发75号文件予以否定。

（2）一九三六年“勾结”蒋介石、陈立夫等，“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

的问题。刘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代表，于一九三六年初派人同南京国民党代表谈判联合抗日，是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的。谈判过程和结果，党中央完全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同蒋介石、陈立夫的阴谋勾结。

(3)“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领导同志根据党中央“大力开展对敌伪政权上层分子的联络工作”的指示，曾派军部工作人员冯少白同志，利用亲戚关系，四次进入敌占区，进行分化、瓦解敌人的活动。冯于一九四一年第一次去敌区，在接受陈毅同志交给的任务后，行前曾请示过刘少奇同志。一九四二年以后冯再次去敌区时，刘少奇同志已离开新四军回延安。原审查报告把这件根据党中央指示进行的工作，说成是刘少奇同志“派遣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是蓄意篡改情节，颠倒是非。原中央专案组已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给冯少白同志复查平反，撤销了原来诬称他是“投敌叛变分子”的结论。

(4)“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从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期间，党中央、毛主席在一些文件、命令和社论中，已经指出国内形势的发展，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和平民主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底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和二月一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时局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和平民主建国的新阶段”、“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这同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后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随着形势的发展，刘少奇同志也是同党中央一起改变了上述估计。对这件事，一九四六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用自我批评精神，代表中央总结过经验教训。本来，这是历史上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原审查报告又把它翻出来，作为刘少奇同志个人的罪名，是有意的陷害。

(5)通过孟用潜同司徒雷登“勾结”的问题。这是原专案组将孟用潜同志当作“相当大的美国特务”进行审讯时，靠逼供信搞出来的假口供，据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证明，并无其事。

(6)“同美特王光美结合”的问题。这是妄加的罪名。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复查，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对王光美同志的历史已作出结论：王光美同志的政治历史清楚，

没有问题。

(7) 派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供给情报的问题。一九五三年香港的某特情提供假情报说：王光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香港所属特务在大陆的重要情报来源。经公安部立案审查，已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查明原情报是蒋特的反间计，即决定撤销对王光琦同志的怀疑。原专案组没有任何根据，即否定公安部早已销案的事实，仍依据原来的假情报给王光琦同志定罪，并说王是刘少奇同志派遣的，纯属政治陷害。

(五) 所谓“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

原审查报告还认定，刘少奇同志在全国解放后，犯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等“罪行”，说他已经“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实践证明，建国以后十七年，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同志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同样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并且是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这期间，尽管我们党在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犯过一些错误，刘少奇同志也犯过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一般地都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同志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外事活动方面，刘少奇同志一向是按照党的对外工作方针、路线行事的。所谓“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纯系罗织“罪名”。

根据以上复查结果，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同志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

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过去对于刘少奇同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特作如下决议：

（一）撤销中发（68）152号文件（即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中发（68）155号文件（即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二）在适当时间，由中共中央商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

（三）过去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

（四）中央这个决议和附件，发至基层党支部，并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步骤，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群众，以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通过）

鉴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异常艰巨和复杂，为了便于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能够集中精力，考虑和决定国内外事务中的重大问题，同时使党的各方面大量日常工作能够及时地有效率地得到处理，中央需要建立有系统地进行经常工作的机构，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

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中央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

中央书记处设总书记一人，书记若干人，候补书记若干人。总书记、书记和候补书记由中央委员会直接选举产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1）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

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4）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

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



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四、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五、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5)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6)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7) 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〇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



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〇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〇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〇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〇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〇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

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8）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多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9）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10）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



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一九五二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11）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12）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

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3）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4）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一九五六年一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15）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指出：社

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and 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16）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一九六五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

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7）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 year 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



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一九六〇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

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一九六〇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实行。

（18）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



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

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1)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

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23) 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

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24)“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想法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

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历史的伟大转折

（25）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揭发

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26）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



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一、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党及时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本事实。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既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国家的光明前途作了论证，加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统一。一九八〇年八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性任务。同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判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活动，对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的良好影响。

二、党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党指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在这些方针指导下，轻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工业内部结构正朝着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恢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财政分级管理等在内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正结合经济调整有步骤地进行。党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

上的失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两年的粮食产量是建国以来最高的，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的生产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由于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三、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遭受冤屈的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各界的领袖人物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建树的历史功勋。

四、在全国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五、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得到加强，省、县两级人代会增设了常设机构，县级和县级以上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正在普遍实行。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正在健全。地方和基层组织的权力正在逐步扩大。取消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制订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包括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制订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的工作。打击了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公开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

六、党大力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五中全会增补政治局常委委员，成立中央书记处，有力地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建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其他有关党内法规的制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纪律检查机关为纠正不正之风所做的工作，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党的舆论机关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在这些方面着手做了一些工作。由于调整了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和实行党政分工，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得到加强。

此外，党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工作，民族工作，统战工作，侨务工作，军事工作和外交工作等方面，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总之，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我们的工作中还有失误和缺点，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正在日益提高。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27)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8)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29) 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

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总结了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

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四、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

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在这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六、关于党的建设。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常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30)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

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一九三〇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

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

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他还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

互助。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将永远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

(31)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32) 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

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还要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

(33)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并且坚决地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作斗争。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34)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的，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这个党的领导，没有这个党在长期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形成的血肉联系，没有这个党在人民中间所进行的艰苦细致的有成效的工作和由此而享有的崇高威信，那末我们的国家就必然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而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只能被断送。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但是党和人民的亲密团结必定能够纠正这种错误，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

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状况、领导制度以及同群众的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只要我们认真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巨大的责任。

（35）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

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党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同时又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大等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并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

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

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部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

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论和行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

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人民解放军要加强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军事科学研究，进一步提高战斗力，逐步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要恢复和发扬军队内部和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紧密团结的优良传统。民兵建设也要进一步加强。

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十、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高度民主的

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根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必须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清除那些欺压人民的腐化变质分子。党在对国家事务和各项经济、文化、社会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从各方面保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保证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组织主动负责地进行工作。党要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在国家事务的重大问题上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协商，尊重他们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36) 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分子在伺机捣乱，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37) 经过建国三十二年来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过近几年来思考和总结，全党同志和我国各族爱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前途，我国各族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

(38) 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只要全党紧密地团结一致，并且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一致，那么，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虽然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总的趋势必然会日益兴旺发达。

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十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全会号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徘徊前进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没能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这一任务。

ISBN 978-7-202-06982-0



9 787202 069820 >

定价：32.00元